

广西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圣地之争——罗马教廷与犹太复国主义关系

姓名：郑玉珠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世界史

指导教师：罗爱林

20070401

圣地之争

——罗马教廷与犹太复国主义关系（1897 - 1922）

研究生：郑玉珠 导师：罗爱林副教授 专业：世界史

研究方向：欧美近现代史 年级：2004 级

中文摘要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前期，它与罗马教廷因圣地问题而产生了激烈的冲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返回故土，重建犹太国”目标遭到以罗马教廷为首的天主教會的阻击。一方面，罗马教廷站在神学立场上来反对犹太人。他们认为，基督耶稣曾在那撒勒预言犹太人将会被毁灭……犹太人会在所有国家中被罚作奴隶，并且他们将流散于世界各地，直到世界末日……根据《圣经》，犹太民族必须经常过着散居的生活，在其他国家中流浪。这样，不仅通过《圣经》，而且通过他们自身的存在，犹太人可以提供对基督预言的活生生的见证。因此，他们决不能容忍圣地巴勒斯坦重新回到“救世主的谋杀者手中”。另一方面，罗马教廷对巴勒斯坦的世俗之地怀有觊觎之心。意大利统一后，罗马教廷与意大利政府因“罗马问题”而关系紧张，双方互相攻讦，各不相让。在意大利政府的全力封堵下，教廷意识到“罗马问题”的解决已经遥遥无期，于是，它便将其目光转移到巴勒斯坦。它开始考虑在巴勒斯坦的世俗统治，把它作为其在罗马统治丢失的补偿。因此，双方围绕着圣地问题展开争夺。

在圣地巴勒斯坦的冲突中，犹太复国主义与罗马教廷都竭力大国因素达到各自的目的。罗马教廷力图通过巴勒斯坦的国际化来确保自己在未来的巴勒斯坦占有一席之地，从而恢复罗马教廷过去的国际威望和对欧洲事件进程的影响。与此相反，犹太复国主义反对巴勒斯坦的国际化，它希望借助大国对其事业的支持而实现它的复国理想。一战爆发后，以魏兹曼为首的犹太复国主义成功地将他们的运动目标与英国的中东战略捆绑在一起，并赢得了英国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坚定支持。贝尔福宣言和英军控制巴勒斯坦，这两件事对于犹太复国主义和罗马教廷都有非常深远的影响。贝尔福宣言的发表，使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首次获得了一个强国的正式支持，使他们复国目标的实现在国际上有了政治保障，另外，英国军队对巴勒斯坦的控制则极大地增强了贝尔福宣言实施的可行性。反过来，罗马教廷在巴勒斯坦不仅面临着以英国为后盾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挑战，而且它的圣地国际化主张及其在圣地的意图都暗藏着失败的危险。因此，罗马教廷转而依靠以法国为首的天主教国家来应对来自圣地的威胁。由于法国与英国就中东问题达成分赃协议而放弃了对教廷的支持，这使教廷遭遇到失败。

本文以中文有关资料和英文资料为基础，试图站在从一个东方人的角度对犹太复国主

义与罗马教廷在圣地问题上的矛盾进行研究。本人是以巴勒斯坦的局势为背景并结合当时的国际形势来探讨这个问题，着重解决二者间冲突的起源、二者间关系的变化过程及其因素等问题。

关键词：罗马教廷 犹太复国主义 圣地 贝尔福宣言

Struggle in Holy Land— The Relations of The Holy See and Zionism (from 1897 to 1922)

Abstract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Zionism movement, there were a very intense conflict between Zionism and the Vatican. The goal of the Zionism movement, which is returning to their native land and reconstructing the Judea country, led to the Holy See's opposition. On the one hand, the Holy See stood on the theological position to oppose the Jew. They thought that Christ had predicted in Jerusalem that the Jew would be destroyed.....that the Jew would be punished to be slaves and banished all of the world till the end of the world.....According to the Good Book, the Jewry must always live separately and tramped among the other nations, so that they may render the witness to Christ not only by the the Good Book.....but by their very existence, so they would not allow Palestine to be returned back to the hand of Christ's murder. On the other hand, the Holy See coveted the Palestinian land. Following the unification of Italy,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Holy See and the Italian government became strained because of "the Roman question". As a result of the Italian government's obstruction, Vatican realized that it was impossible to resolve "the Roman question". So, it paid its attention back to Palestine.

In Holy Land's conflict, both Zionism and the Holy See were all trying to win the support of Powers to achieve respective intention. The Holy See attempted to ensure their occupying certain rights at Palestine in the future and restoring the Holy See past prestige. On the contrary, the Zionism, who wanted to realize its ideals reconstructing their hometown with the aid of the great powers, opposed strongly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Palestine.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 Weizmann as the head of the Zionist succeeded in winning the British unwavering support. The two incidents, which included Balfour Declaration and the British control of Palestine, had very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Zionism and the Holy See. Thanks to the publication of Balfour Declaration, the Zionism organization won a official support from a powerful nation for the first time. Moreover, the controlling over Palestine by the British army enhanced greatl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Conversely, the Holy See not only faced the challenge came from Zionism who wan the British's help, but also its claim that the Hole Land must be internationalized and its intention to the Hole Land were intended to be a failure. Therefore, the Holy See turned to the Catholic countries such as France to cope with the threat coming from the Holy Land. Because France came to the agreement with English for dividing the booty on Middle East question and gave up its support to the Vatican, the Vatican

was defeated in the conflict with the Zionism at Palestine.

Being base on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material, the paper attempts to stand on Chinese standpoint to study the problem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Zionism and the Holy See. the author put this problem o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t that time and emphatically solved the origin and the changes of relation between both sides and so on .

Key words : the Holy See Zionism the Holy Land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提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含其他个人或机构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承担本声明的法律责任。

研究生签名：_____日期_____

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广西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广西师范大学、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清华大学论文合作部，有权保留本人所送交学位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文档，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本人电子文档的内容和纸质论文的内容相一致。除在保密期内的保密论文外，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公布（包括刊登）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论文的公布（包括刊登）授权广西师范大学学位办办理。

研究生签名：_____日期：_____

导师签名：_____日期：_____

前 言

圣地问题的争端一直存在于罗马教廷与犹太复国主义之间。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初期,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就意识到圣地耶路撒冷在广大基督教徒心目中的重要性以及罗马教廷在基督教世界中的影响力,他竭力向罗马教廷说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绝不会对他们在圣地的利益构成威胁,因为犹太人根本不会介入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圣地。教皇庇护十世则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就是在巴勒斯坦重新确立犹太人的统治地位,而犹太人否认耶稣的神性,理应受到神的惩罚,他们在巴勒斯坦的复兴则违背了神的预言;如果犹太人企图重新染指圣地,罗马教廷则绝对不答应。1917年,索可洛夫访问梵蒂冈时,他却受到罗马教廷的热情接待,并且教皇迪克十五世反复地用“我们会是好邻居”这句话来表达其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同情立场。这是由于,教廷准确地估计到英国会出现在巴勒斯坦,他力图利用战争中出现的对巴勒斯坦局势重新洗牌的新形势,依靠英国因素而达到其目的,借此也就排除了就圣地问题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对话的可能性。另外,索可洛夫再三向教廷表示,犹太复国主义者不会染指圣地,只要世俗的地区。然而,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英国的影响力上升,犹太复国主义者遂加强了与英国的合作并取得英国的保护,梵蒂冈逐渐被排除在巴勒斯坦问题之外。在这种情况下,梵蒂冈开始实行敌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政策。探讨罗马教廷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无疑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以及以色列建国的历程。同时,通过展示双方围绕圣地问题的矛盾斗争,可以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中东尤其是巴勒斯坦地区的敏感性和复杂性,加深对当今中东问题的认识。

近几十年来,国际学术界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研究已经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大多数的研究都侧重于三方面:英法美等西方大国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影响;阿犹冲突的起源、发展过程以及影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自身的发展历程。对于罗马教廷与犹太人的关系问题,史学界却鲜有涉足。国外的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还刚刚起步,目前仅有塞吉奥·米纳尔比(Sergio Minerbi)出版了一本专著《梵蒂冈犹太复国主义在圣地的冲突:1897-1929年》。由于作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带有明显的个人倾向性,这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其理论的创新与拓展。国内学者涉足极少,迄今所见只有吴传华的《以色列与梵蒂冈之间关系的症结与走向》(《西亚非洲》2004年第6期)。该文以当代以色列与梵蒂冈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主要通过对犹太人和罗马教廷之间的历史渊源的研究来诠释以色列与梵蒂冈之间政治宗教关系的现状,并预测两国关系的未来走向,没有涉及到本文所研究的领域。所以,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

笔者正是以相关中文资料和英文资料为基础,以马列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从一个东

方人的视角对这段历史进行透视分析，力争得出一种理性、科学的结论。以便使我们全面地了解犹太人的复国运动历程；清晰地展示出圣地巴勒斯坦问题的敏感性和复杂性的所在，为国人对中东问题正确认识的形成提供一定的智力支持。

由于已有的研究成果和资料较为缺乏，研究工作存在较大难度，本人在此仅是对犹太复国主义与罗马教廷的关系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和研究，再加上本人才疏学浅，不足之处敬请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处在十字路口的巴勒斯坦地区

(一) 奥斯曼的帝国遗产与西方列强的争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和西方列强主宰着巴勒斯坦的命运。一方面，奥斯曼帝国日趋衰落，成为“垂死的病人”，无力有效维护它对巴勒斯坦的统治；另一方面，西方列强则虎视眈眈，为争夺奥斯曼帝国的“遗产”而相互角逐。

1. 土耳其在巴勒斯坦的残喘统治

16 世纪奥斯曼帝国征服叙利亚地区后，土耳其人把叙利亚划分为三个省（也称为帕夏区）：阿勒颇省、大马士革省和特里波里省。这些行政区称为“桑贾克”（土耳其语），直接听命于土耳其总督（帕夏）。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土耳其人按古名称将上述三个地区统称为叙利亚，它是由现代意义的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巴勒斯坦组成。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作为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巴勒斯坦还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

1864 年“行省制度法”把巴勒斯坦大体上划分为三个地区（县）：南部的耶路撒冷地区，包括耶路撒冷、雅法、加法、希伯伦、贝尔谢巴和哈菲尔，由于耶路撒冷的特殊宗教地位，该地区于 1887 年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单位而设立，由奥斯曼中央政府直接领导（类似于今天的直辖市）；北部的阿克地区隶属于贝鲁特省；中部的纳布卢斯地区则属于大马士革省。巴勒斯坦虽然名义上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但其实际权力，尤其是基层的权力仍然掌握在当地阿拉伯人的大部族氏族手中。每个氏族都由族内有权势的家族任命的部落酋长——谢赫来领导。这些谢赫们构成当时巴勒斯坦的精英阶层，谢赫是农村的最高统治者，也是奥斯曼帝国政策的贯彻执行者，职责是征税和维护本地区安全，其权力则由奥斯曼帝国的当地行政长官（瓦里）所授予。

进入 19 世纪下半期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内政外交陷入了全面的危机，它对巴勒斯坦地区的统治越来越力不从心。

1877—1878 年俄土战争结束后，土耳其的财政已完全崩溃。当时土耳其政府因为无法偿还大约 62.25 亿法郎的外债而宣布破产。英法等国利用这一机会，于 1881 年 12 月迫使苏丹颁布“斋月法令”，成立奥斯曼帝国国债管理处，以保证支付总数达数十亿法郎的债款及利息。该管理处由各债权国代表组成，英法两国轮流担任主席。这个管理处掌管了土耳其的关税及国内部分重要生活品的专卖收入和税收，这样一来，土耳其的独立自主事实上受到限制。

到 19 世纪下半叶，土耳其的治外法权制度适用范围越来越广泛。根据这项制度，土耳其政府官员无权干涉外国侨民的事务，也不能进入其家宅。如果事先得不到外国领事的

1864 年“行省制度法”的内容是：帝国境内的行政管理区划分为省级、地区级（县）和低于地区级的乡。这些行政单位都由一位隶属于中央政府的官员领导。

彭树智主编：《阿拉伯国家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83 页。

1535 年土耳其苏丹苏雷曼一世与法王弗朗西斯一世签定了投降条约（the Capitulations Treaty），其中包括双边特惠条约和治外法权两部分。

同意，甚至不能起诉外国侨民，换言之，外国侨民不受土耳其法律的约束，他们享有外交豁免权。领事们客观上掌管着国中之国，他们藐视土耳其政府官吏，动辄以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为借口出面干涉。治外法权制度严重地侵蚀了土耳其的主权，极大地削弱了奥斯曼帝国对巴勒斯坦的有效统治。

巴勒斯坦位于亚非大陆连接处，是欧洲通往东方的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尤其在苏伊士运河通航后，它扼大西洋和印度洋水路交通的咽喉。因此，英、法、意、德等欧洲列强都加紧了对巴勒斯坦的渗透。他们为争夺帝国遗产而相互倾轧。只是由于他们中的任何一强都无力实现独吞，才使奥斯曼帝国能够得以苟延残喘。

2. 西方列强在巴勒斯坦的争夺

随着奥斯曼帝国的急剧衰落，西方各国在巴勒斯坦的角逐日趋激烈。到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经过近四百年的努力，在与英国对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叙利亚、黎巴嫩的争夺过程中，法国逐渐取得优势地位。

事实上，早在奥斯曼帝国初期，法国就开始觊觎叙利亚和黎巴嫩。1536 年，法国首先从奥斯曼帝国获得外国人所得到的第一个特权：取得对叙利亚和黎巴嫩地区天主教的保护权以及法国商人在帝国境内经商的自由权。17 世纪后半期，法国在该地区的特权与日俱增，与此同时，法国传教团在各地设立了传教和教育机构，教授法语，传播文化。在两次埃土战争中，为了争夺奥斯曼帝国境内阿拉伯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及宗教等霸权利益，英法等列强势力卷入战争。英国首先拉拢俄、普、奥等国胁迫土耳其签订了“解决近东事件的条约”，即伦敦条约。然后，为了孤立法国，进一步打击法国所支持的埃及，英国利用武力迫使埃及军队撤出叙利亚。结果，英国在东方的势力明显增强，法国的影响遭到削弱。但是，法国依然握着对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保护权。到 19 世纪末，虽然德俄等列强进一步加强对奥斯曼帝国的争夺和渗透，但英法仍保持着对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力，叙黎地区也仍旧是法国主要的势力范围。法国在该地区大肆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方面的渗透。实际上，法国就是企图以既定事实来迫使国际社会承认叙利亚、黎巴嫩是法国的独家势力范围。

德国势力在 19 世纪 80 年代迅速渗入土耳其。它利用土耳其与英法之间的矛盾来加强自己在土耳其的地位。尤其是在 1888 年，它从土耳其手中取得修筑巴格达铁路（“三 B 铁路”）的特许权。该铁路一旦建成不但便于德国对土耳其及其邻国的控制，而且因为在波斯湾取得阵地，对英属印度殖民地也构成严重威胁。这条铁路也使在中近东具有殖民利益的其他国家惴惴不安，沙皇俄国认为它也威胁到了属于自己殖民利益范围的外高加索和北部伊朗的安全。德国的行动打破了中东地区国际力量的平衡，引起德、英、俄、法等国在中东地区的激烈争夺。巴勒斯坦由于处于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而成为西方列强争夺的

Isaiah Friedman, Germany Turkey Zionism:1897-1918,Transaction Publishers,New Brunswick(U.S.A) and London(U.K) 1998, P.33.

两次埃土战争分别发生在 1831 - 1833 年和 1839—1841 年。

重点。

（二）罗马教廷在圣地的传统利益

作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发源地，巴勒斯坦一直是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和犹太教徒向往的圣土。天主教会的罗马教廷在圣地不仅具有千丝万缕的宗教利益，而且这种宗教利益的内部冲突又同国际政治因素掺杂在一起，从而使纯粹的宗教事务具有世俗性。

1. 罗马教廷在圣地的传统影响

罗马教廷在圣地的主要宗教机构有两个。一个是耶路撒冷主教区，该教区的红衣主教代表教皇监察这个教区。1847年，教廷扩展了耶路撒冷主教区的教育体系，并为有志于献身教士事业的当地阿拉伯人开创了新的神学院。在耶路撒冷，另一个深深植根于天主教教义的机构是圣地守护队（The Custodia Terrae Sanctae），1230年成立于巴勒斯坦。1333年，那不勒斯国王罗伯特从苏丹那里获得对圣地的权利，并在1342年得到教皇的承认。圣地守卫队以圣地守护官（the Custos of the holy Land）为首，他是一位意大利籍的方济各会的牧师。根据1912年11月17日教皇庇护十世的训令，这些职位如下分配：圣地守护官由一位意大利人担任，教皇的代表则是一位法国人，检察员是一位西班牙人，宗教理事会的两名成员分别由一名意大利人和一名法国人或者一名德国人担任。对于红衣主教和圣地守护官之间的职责冲突问题，天主教会采取这样一个办法来解决，即被任命为主教的教士必须曾两次担任圣地守护官。

在包括圣地在内的中东地区，罗马教廷还控制着许多东方教会。这些教会接受罗马教廷统治，但他们仍奉行自己不同的习俗，并享有相当的自治权。根据不同的习俗，这些教会（或团体）分为如下团体：亚历山大礼拜式，主要是科普特人和埃塞俄比亚人；安提奥克尼派（the Antiochene）包括马龙派教徒；亚美尼亚教派，他们的信徒在18世纪皈依天主教；拜占庭教派，包括玛尔凯特人，或希腊天主教徒；最后，还有加勒底教派。其中，以大马士革为中心的玛尔凯特人最具代表性。

罗马教廷在圣地进行的主要宗教活动。19世纪末，天主教会创立了30个团体和协会、20所女修道院和男修道院、18所济贫院、6所中学和5座医院。天主教会的这些活动都得到了法国、匈牙利、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的大力支持，他们通过对教会的活动提供有力的财政支持，从而加强其在巴勒斯坦的存在。20世纪初，天主教在圣地的活动主要是慈善性的：修建孤儿院、看护之家、残疾人收容机构，开办业余学校，创建福利工厂。

方济各会是天主教托钵修会之一，一译法兰西斯派，是拉丁语小兄弟会的意思，因其会士身穿灰色会服，故又称灰衣修士。1209年意大利阿西西城富家子弟方济各(Francisco Javier 1506-1552)得教皇英诺森三世的批准成立该会，1223年教皇洪诺留三世批准其会规。方济各会提倡过清贫生活，衣麻跣足，托钵行乞，会士间互称“小兄弟”。他们效忠教皇，反对异端，中世纪时曾为替教皇出售赎罪券而到处游方。

Sergio I. Minerbi, The Vatican and Zionism: Conflict in the Holy Land 1895-192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5.

Sergio I. Minerbi, The Vatican and Zionism: Conflict in the Holy Land 1895-1925, p.6.

总之，罗马教廷主要借助于它在圣地的宗教机构及其控制下的众多东方教会，通过在圣地有效地开展宗教活动来宣示其宗教影响。

2. 罗马教廷在圣地问题上的纷争

罗马教廷在圣地问题上的纷争是极其复杂的。一方面，由于某些圣地（如圣墓大教堂和伯利恒耶稣诞生地的长方形大教堂）的所有权问题久拖未决，这在不同的教派之间产生激烈的冲突，尤其在天主教和东正教之间的冲突最典型。另一方面，基督教会内部错综复杂的斗争又往往和国际政治纠缠在一起，教会努力借助大国力量使自己在圣地的争夺中居于有利地位；反过来，大国则通过对教会活动的有利干预，从而加强自己对巴勒斯坦的影响力。

法国首先取得了对天主教会的保护权，并籍此加强了其在圣地的存在。1535年，苏丹苏雷曼一世与法国国王弗朗西斯克签定了双边特惠条约（the Capitulations Treaty），根据这个条约，苏丹同意给予法国臣民在奥斯曼帝国境内以特殊的权利。于是，天主教会请求法国来保护它在土耳其的利益。从此，法国开始获得在圣地对天主教的宗教保护权。1740年，法国在奥斯曼帝国范围内把对个人或团体的保护扩展到对所有天主教徒的保护，这种保护权紧接着又推广到包括地中海沿岸及东部各国的天主教徒身上。此外，由于罗马教廷和奥斯曼帝国没有直接的外交关系，因此法国实际上是作为罗马教廷在奥斯曼帝国的代表而进行活动的。这样，法国和天主教都得到了相应的好处：法国这种天主教保护人的身份使它在东方具有超越其他国家的优势，天主教徒则在奥斯曼帝国境内享有特权，从而使他们的宗教利益获得了可靠的保障。

面对法国利用宗教问题在圣地的扩张，俄国也紧随其后。1774年俄土之间签订的《库楚克—凯纳吉条约》，使俄国得到“保护”土耳其境内东正教徒的权利。

圣地管辖权本来是个宗教问题，但由于它涉及到各国统治者的政治考虑及各国间的争霸关系，因此围绕这个问题经常发生争执。所谓圣地保护权是指在耶稣的坟墓所在地耶路撒冷和耶稣的诞生地伯利恒教堂内享有一切豁免特权。由于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基督教居民几乎都信奉东正教，天主教徒人数不多，到18世纪东正教徒就掌握了以上两个礼拜地点的管辖权，即掌管圣地教堂钥匙，占有朝圣收入。法国路易·波拿巴为赢得国内天主教徒对其登上皇帝宝座的支持，于1850年再次挑起事端，要求土耳其苏丹恢复天主教在圣地享有的特权。1851年，他一再向土耳其施加压力，甚至派舰队威吓，土耳其政府被迫让步，同意将圣地的钥匙交给天主教徒掌管。沙皇则针锋相对，于1853年春，向土耳其政府提出抗议，指责土耳其迫害东正教徒，反对在圣地问题上向法国让步，要求恢复东正教徒管辖圣地的权利，并进而要求通过俄土条约保证沙皇对土耳其境内东正教徒的保护权。派到土耳其谈判的俄国特使緬希科夫甚至威胁说，如果谈判破裂将兵戎相见。

Isaiah Friedman, Germany Turkey Zionism:1897-1918, Transaction Publishers, New Brunswick(U.S.A) and London(U.K) 1998,p.33.

1768 - 1774年俄土战争后，俄土签订了《库楚克 - 凯纳吉条约》。

英法表示不能容忍俄国的要求，两国驻土大使缔结秘密协定，决定在此问题上一致行动，共同对付俄国。推动英法联手的主要原因在于：征服土耳其，控制黑海两海峡，进入地中海，夺取巴尔干，是俄国历来向外扩张的战略目标。如果俄国达到其目的，这将威胁到英国在地中海东部和印度的利益，而且还随时有可能切断英国通往印度的陆路交通线。同时，法国企图利用东方问题离间大陆同盟，从而使法国摆脱在国际上孤立的局面。拿破仑三世的外交大臣德路恩·路易斯十分露骨地说：“关于圣地问题以及一切和它有关的问题，对于法国都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只是帝国（法国）政府拆散大陆同盟的工具。这一同盟几乎在半个世纪内使法国陷于瘫痪。最后才出现了在强大的同盟中挑起不和的可能，拿破仑皇帝便紧紧抓住不放。”因此，他们虽然劝告土耳其苏丹承认东正教徒在圣地的地位，但决不承认沙皇的保护权和同其签订的条约。在英法的支持下，土耳其政府向缅希科夫作了上述答复。就这样，“圣地问题”有关各方互不让步，终于导致克里米亚战争。克里米亚战争是宗教问题政治化的经典事例，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以罗马教廷为首的天主教会和以俄国为首的东正教会针对圣地的争夺。

在群雄逐鹿的巴勒斯坦，罗马教廷利用大国之间的利益纷争有效地维护着自己在圣地的利益。首先，它借助法国在圣地对天主教会的宗教保护权而极大地缓解了来自土耳其人的威胁。因为自从16世纪以来，圣地巴勒斯坦一直处于奥斯曼帝国的控制之下，凭借法国的宗教保护权，天主教徒不仅在圣地而且在奥斯曼帝国境内都不受帝国法律的约束。其次，它也依靠以法国为首的天主教国家的支持，与东正教争夺圣地的主导权。总而言之，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列强的觊觎、基督教与其他教派关于圣地问题的纷争和基督教内部的钩心斗角构成了巴勒斯坦的复杂形势。

自1880年以来，随着以促进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重建民族家园为宗旨的“热爱圣山运动”的兴起，犹太人逐渐构成耶路撒冷的多数民族，尽管这时的耶路撒冷仍旧只是一座拥有约3万人口的小城。在那年，犹太人约17000人，穆斯林约8000人，基督徒约6000人。伴随着20世纪初犹太人的大量流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13年，耶路撒冷拥有75200人，其中犹太人48400人，穆斯林10050人，基督教徒16750人。在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的过程中，“热爱圣山运动”逐渐地发展成为一个新型的、更大规模的犹太民族主义运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于是一支新兴势力——犹太复国主义出现在耶路撒冷。这样，罗马教廷数百年来在圣地致力于保护天主教的权益、反对其他基督教派和奥斯曼帝国的统治的努力，现在又开始遭遇到一种新的挑战。

（三）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兴起

1. 解放浪潮和同化的梦想

[苏]B.П.波将金：《外交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819-820页。

R. Bachi, *The Population of Israel*, Jerusalem 1977, p.373.

M. Harel, "The Jewish Presence in Jerusalem Throughout the Ages," in *Jerusalem*, New York, 1974, p.147.

17 - 18 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和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催生了近代民族主义思潮，民族自由、民族平等、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思想意识在欧洲大地广为传播。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进行反思，提出不应再歧视和压迫犹太人，应给予他们平等和自由的权利。高举“自由、平等、博爱”大旗的法国大革命，最终使饱受苦难的欧洲犹太人似乎看到了新时代解放的曙光。

法国大革命加快了解放犹太人的进程。1791 年 9 月，法国制宪会议赋予法国犹太人以国家公民身份进行宣誓的权利。1806 年 7 月，在犹太知名人士会议上，拿破仑的犹太事务顾问莫莱伯爵向犹太人提出“皇帝的 12 个问题”，涉及到犹太人的婚姻法、司法权、对国家的忠诚等许多方面。与会名人领悟到“皇帝的良苦用心”，对所有问题做了回答。拿破仑不失时机地在该年 9 月颁布“召开犹太教公会议的命令”，要求把犹太知名人士对 12 个问题的回答变为宗教誓约。1807 年 2 月犹太教公会议按皇帝的旨意通过了相关文件，第一次使犹太教享有同天主教、新教在法律上完全平等的地位，正式受到政府的保护。随着拿破仑战争的扩展，德意志各邦先后在宪法中废除了“犹太人在法律上无权”的条款，赋予犹太人以公民权，其他如意大利、荷兰和英国等欧洲国家也先后宣布“解放”犹太人。到 19 世纪 60 年代，犹太人在大多数欧洲国家都依法得到不同程度的解放。

犹太人在获得解放后，他们的自由、民主意识大大增强。他们纷纷要求走出“隔都”（Ghetto），融入居住国的主流社会。许多人兴高采烈地沉浸在“同化”的迷梦中，掀起了称为“哈斯卡拉”（Haskalh，意为启蒙运动）的社会文化运动。在摩西·门德尔松和伊萨克·莱温佐恩等人的领导下，改革传统的犹太教教育，破除不适应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淡化犹太礼仪中明显的正统色彩，在诵读经文时用当地语言取代希伯来语，遵循犹太·莱布·戈登的“在外是当地人，在家是犹太人”的格言。德国犹太人加布里尔·里塞尔断言：“我们要依附于德国人民，无论在何处我们都将依附于他们。”他把犹太教和德国精神的结合概括为：“我们有一位父亲和母亲，父亲是上帝，万民之父，在天宇；母亲是德意志，在地上。”他们认为，只要改宗了基督教，做一个忠实的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奥地利人、意大利人，不再给人一种“流浪的犹太人”的印象他们最终就会为当地的主流社会所接受，摆脱当地社会对他们的偏见和敌意，获得绝对的平等和彻底的解放。这就是当时流行的“同化”理论。许多犹太人和非犹太人都把它作为解决欧洲社会“犹太问题”的灵丹妙药。

一时间，获得解放的犹太人似乎沐浴在自由、平等的春光里。

2. 解放和同化梦想的幻灭

无论欧洲各国政府的解放政策，还是犹太人自己走出隔都的“启蒙运动”都没有使犹太人真正地、永久性地获得自由平等的权利。政治上，各国统治者出于缓和国内阶级矛盾、

潘光、余建华、王健：《犹太民族复兴之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9 页。

罗马教廷在 1180 年颁布了一项歧视性法令，规定犹太人必须与基督教徒分开居住。因此，犹太人在欧洲被迫聚居

于专门的区域，人们把这种从城市中划出来强迫犹太人集中居住的区域称为“隔都”。

沃尔特·拉克著，徐方、阎瑞松译：《犹太复国主义史》，上海三联书店 1992 年版，第 10 页。

沃尔特·拉克著，徐方、阎瑞松译：《犹太复国主义史》，第 10 页。

转移人民斗争视线的考虑，往往有意识地对犹太人与当地主体民族之间的矛盾推波助澜；再加上寄居国各党派争权夺利的需要，使犹太人时常成为各种斗争的牺牲品。经济上，在空前激烈的资本主义竞争环境中，逐渐膨胀起来的各国犹太资本日益遭到当地主体民族的新兴资产阶级的嫉妒和敌视，经济利益上的冲突自然而然地成为反犹主义的一大动因。文化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欧洲基督教世界对犹太宗教根深蒂固的偏见，与日益上升的狭隘民族主义相结合，使犹太人继续被视为一个异己的劣等民族而受到各种歧视和诽谤。由此，在经历了一段短暂的“解放犹太人”浪潮后，19世纪中下叶欧洲反犹主义浪潮又趋回升。

俄国1881年的排犹屠犹浪潮最具代表性。14-15世纪西欧诸国周期性的迫害和驱逐把大批犹太人赶到中欧和东欧，到19世纪中叶，全世界的犹太人约为475万，其中东欧占72%，西欧占14.5%，美洲占1.5%，东方各国占12%。而俄国通过瓜分波兰和大肆扩张，逐渐成为世界上犹太人最多的国家，全球近1000万犹太人中有500万居住在俄国。从18世纪末起，沙皇政府一直对俄国犹太人实行歧视和迫害政策，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实施歧视性的栅栏区（Pale of Settlement）制度，严格限制犹太人的居住和活动范围。在沙皇政府残酷的迫害下，大多数犹太人没有固定职业，朝不保夕，象“空气人”一样漂泊不定，甚至反犹的俄国报纸也承认：“大多数犹太人由于饥饿正慢慢地走向死亡”。二是推行同化政策，引诱或逼迫犹太人皈依东正教。尼古拉一世颁布“兵役法”，规定12岁（后提前到8岁）到18岁的犹太孩子要到童子学校接受军训，而后再服25年兵役。这一方面是为了扩充兵源，另一方面就是为了利用童子军校和兵营诱逼犹太青少年改变信仰。这些做法使犹太孩子在精神和生理上倍受摧残。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遇刺事件引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反犹狂潮。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即位后，他的顾问——东正教神甫康斯坦丁·波别多诺斯采夫——制定了解决犹太人问题的疯狂计划：将犹太人1/3消灭、1/3驱逐、1/3同化。在政府的默许和支持下，对犹太人的袭击、驱逐和屠杀很快由乌克兰南部蔓延到整个沙俄帝国。暴徒的肆虐，政府的敌视，甚至信奉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的冷漠，一再表明俄国犹太人“解放”与“同化”的前景凄凉暗淡。这使当年哈斯卡拉的一批积极倡导者们从同化迷梦中幡然醒悟。平斯克、利林布卢姆、斯摩棱斯金、犹大·戈登、本·耶胡达等人几乎在同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唯一的出路是重建犹太国、实现民族复兴。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从1882年起，以促进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重建民族家园为宗旨的锡安主义运动组织——“热爱圣山运动”（即希巴特锡安，Hibbat Zion）在俄国苏瓦乌基等地建立，其成员“圣山热爱者”（the lovers of Zion）包括以维尔拉比为首的正统派犹太教徒和一部分激进的犹太知识青年。“热爱圣山运动”的活动主要是建立和发展组织，创办刊物，宣传返乡复国思想，并与同化论者展开论战，推动希伯来语的复兴和推广；同时筹集资金，组织犹太人集体移居巴勒斯坦，帮助移居者在当地购买土地，开展殖民活动。此后七八年时间内，“热爱圣山运动”如雨后春笋般在俄国及东欧、西欧甚至北美地区涌

阿巴·埃班：《犹太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93页。

潘光、余建华、王健：《犹太民族复兴之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36页。

沃尔特·拉克著，徐方、阎瑞松译：《犹太复国主义史》，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63页。

现,从 1882 - 1883 年的 12 个协会发展到 1889 - 1890 年的 138 个。1885 年成员总数为 1.4 万人,仅敖德萨一地就有成员数千人。1882 年热爱圣山运动内部的一个团体比卢,率先组织犹太青年移居巴勒斯坦,揭开了现代犹太移民移居巴勒斯坦的序幕,从此开始了第一次阿利亚运动。“热爱圣山运动”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为后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大规模兴起奠定了基础,并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20 世纪前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在早年几乎都参加过“热爱圣山运动”。

如果说俄国 1881 年屠犹排犹使东欧犹太人掀起了“热爱圣山运动”,那么,1894 年法国的德雷福斯案则使西欧犹太人的“同化”之梦彻底粉碎,并为成熟的犹太复国主义理论的形成提供了丰厚的土壤。正当“热爱圣山运动”方兴未艾时,1894 年,法国发生了德雷福斯事件。法国炮兵上尉犹太人德雷福斯被指控叛国并被判处终身监禁。“杀死犹太人!”“犹太人滚出去!”成了这一时期法国人的战斗口号,反犹恶浪淹没了法国大地。“德雷福斯案件不仅仅表现为一个司法错误,它还反映了大多数法国人的心态:通过判处一个犹太人有罪,来宣布所有的犹太人都有罪。当佩带从德雷福斯上尉的军服上扯下来时,众人都高喊:‘打死犹太人!……’。这是什么地方?在法国!在共和制的、现代的、文明的法国!在人权宣言发表一百年后的法国!法国人民,或者说大多数法国人并不想让犹太人享有权利。”许多原来主张同化的犹太人在这一事件中彻底失望了。因为在思想最开明、文明程度最高、最早解放的法国,人们对犹太人尚且如此深刻仇恨,那么在那些比法国落后的国家里,他们还指望什么呢?

残酷的现实说明,同化不能解决犹太人问题,已经获得的权利随时可以被剥夺,要避免犹太人为“刀俎鱼肉”,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家园,恢复故国。

3. 犹太复国主义理论的产生

一方面是无情的屠杀和迫害,另一方面同化又不被接受,面对这种窘境,饱受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洗礼的近代犹太人,无法再对新的反犹浪潮逆来顺受了。一些犹太知识分子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最后,他们得出结论:犹太人必须有自己的国家!古代犹太人曾经在巴勒斯坦有过自己的国家,后来这个国家灭亡了,现在要彻底地解决当代犹太人问题,就必须重新恢复犹太国!这种恢复巴勒斯坦犹太国的思想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又称“锡安主义”,它得名于被视为犹太圣山的耶路撒冷锡安山。

第一个从政治角度提出返乡复国理论的犹太思想家是摩西·赫斯(Moses Hess)。1840 年大马士革事件后,他开始摆脱同化论,深入研究犹太问题,于 1862 年在科隆发表《罗马和耶路撒冷》一书。他认为,犹太问题已成了欧洲最后的民族问题;犹太人是一个特殊

David Vital, *The Origins of Zionism*, Oxford, 1980, p. 155-157.

这个协会以《旧约》中的诗句“雅各家啊,来吧,我们在耶和華的光明中行走”(《圣经·旧约》,“以赛亚书”第 2 章第 5 节,第 660 页。)为座右铭。Bilu 就是这一诗句的希伯来文四个字母的缩写。

阿利亚(Aliyah),指犹太人返回故土居住、生活的行动。

西奥多·赫茨尔著,肖宪译:《犹太国》,商务印书馆 1993 年版,第 102 页。

一位圣方济各会托钵僧于 1840 年在叙利亚首都失踪的事件。

的民族，而不是一个宗教团体；犹太人的解放不能靠与其他民族的同化；要彻底摆脱反犹太主义，就要返回故土，在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列奥·平斯克（Leon Pinsker）是犹太复国主义理论形成过程中第二位关键性的人物。平斯克是一位内科医生，曾是文化同化的主要倡导者之一，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遇刺后汹涌而起的反犹风暴，使他意识到自己所致力文化同化运动是徒劳的。基于这种认识，1882年他在柏林匿名出版了《自我解放》。这本小册子成了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他在《自我解放》中指出，犹太问题的解决，不能寄托于虚无缥缈的“解放”，而要“恢复他们自己的民族家园”。他特别强调犹太人应树立自尊自信，发挥主动性，不要坐等欧洲统治者和当地民族的怜悯施舍，而要立即行动起来，实行自我解放。平斯克还提出了复国行动的具体计划，主张召开全俄犹太人大会，商议购置一块土地，以供数百万犹太人居住，并争取大国对这一方案的支持。平斯克开始时并不强调在古老的巴勒斯坦建国，他说犹太人真正需要的是“我们自己的土地”、它“可以是北美的一小块土地，也可以是亚洲土耳其的一块享有主权的帕夏领地”。但不久以后，平斯克就发现，只有把巴勒斯坦作为建国的目标，才能激发起广大犹太人的感情力量。于是他很快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并成为“热爱圣山运动”的领导人。

由此可见，平斯克对犹太复国主义理论的阐述比赫斯大大前进了一步。他不仅更为深入地、更具逻辑性地分析了犹太问题的症结，而且还为犹太复国主义理论提出了实施原则和具体手段、考虑了立国地点等细节问题，因此，当俄国反犹思潮泛滥时，他的理论在广大犹太人、特别是在俄国和东欧犹太人中引起相当大的反响。“热爱圣山运动”等最早出现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把此书奉为“新的《旧约》”而加以广泛宣传，从而掀起了欧洲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的第一次浪潮。

尽管赫斯和平斯克较早提出了犹太人返乡复国的思想，但他们的学说在当时影响有限，并没有得到普遍的传播，也没有引起广泛的反响。真正使犹太复国主义理论形成完整的理论并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治运动的，是西奥多·赫茨尔。

西奥多·赫茨尔（1860—1904）出生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富商家庭，后来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袖。青年赫茨尔与同时代许多犹太青年一样充满同化幻想，希望加入主流社会，成为一名成就卓越的作家和记者。然而19世纪末欧洲不断掀起的反犹恶浪，改变了他的生活道路。最终导致赫茨尔从同化论转变为犹太复国主义倡导者的是德雷福斯案件所带来的震撼。这一案件以及由此引起的疯狂的反犹高潮极大地刺伤了赫茨尔的心灵。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赫茨尔开始将身心全部投入到关于犹太问题的思考中。他初步认识到，犹太人的出路是复国，这样才能躲避反犹太主义的迫害。1895年他在著名犹太慈善家莫里茨·赫希男爵处碰壁后，赫茨尔更加致力于完善自己的计划。他以日记的形式对该计划进行修改和补充。不久，一份系统阐述犹太复国主义的纲领草案形成，赫茨尔起初用的标题是《致罗斯柴尔德家族》，希望用该家族的雄厚财力作为复国计划的财政基

Leon.Pinsker,Auto-Emancipation,<http://www.geocities.com/Vienna/6640/zion/pinsker.html>

础。在著名犹太作家马克斯·诺尔道的积极鼓励下，赫茨尔改写了那份纲领草案，并决定将它公诸于世。1896年2月，赫茨尔的这部著作以《犹太国》为题目在维也纳出版。

赫茨尔在书的起首便开宗明义地宣布：“我在这本小册子里所要表明的是一个古老的思想，这就是重建犹太国家。”他指出，犹太人问题不可能通过“同化”来解决，一方面是因为欧洲普遍存在的反犹主义，另一方面是由于犹太人的生存渴望；反犹主义只会激发犹太民族意识，而后者又会刺激前者。针对当时存在的反犹主义各种各样的说法，他指出，“犹太人问题既不是一个社会问题，也不是一个宗教问题，他是一个民族问题。只有把它作为一个世界性的政治问题，并由全世界的文明国家在会议上讨论，才能使它得到解决。”这一观点的提出是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因为只有认识到犹太人问题是一个民族问题，才能按民族问题的思路来加以解决，那就是建立他们自己的民族国家。他进而指出，犹太人摆脱困境的唯一办法是集体出走到一个犹太人自己的国度，在那里，“我们最终将作为自由的人生活在我们自由的土地上，并将安静地死在我们的家园中”。在复国地点的选择上，他提出了巴勒斯坦和阿根廷，因为“在这两个地方都进行过重要的移民垦殖实验”，但由于“巴勒斯坦是我们记忆中永存的历史家园”，自然可作为第一选择的对象。

更有重要意义的是，赫茨尔还在此书中以相当详细的篇幅探讨了建立犹太国的具体步骤，提出成立“犹太协会”和“犹太公司”这两个机构。前者作为政治机构，负责组织散居各国的犹太人分批逐渐移居新国家；后者作为经济机构，负责金融财政和新国家的工商业发展。他认为大国的政治支持和犹太富豪的经济资助是立国的必要条件。此外，赫茨尔还在书中提出了对未来国家的政体形式、宪法、语言、国旗和军队等方面的主张，甚至谈到了许多细节问题，如七小时工作制、新移民住房设计和建筑、如何安排无专门技能的劳动者等等。这样，赫茨尔首次完整系统地清晰阐述了犹太复国主义的纲领，为创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奠定了理论基础。

《犹太国》一书问世，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理论已经形成。

4.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兴起

1896年《犹太国》发表后，赫茨尔便以满腔热情投入到实施其复国理想的努力之中。当时，赫茨尔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欧洲的上层人物身上，希望利用他们的社会名望和经济实力来推进复国大业。结果，他接连在“伊舒夫之父”埃德蒙·罗斯柴尔德男爵等人那儿碰了壁。随后，他会见了巴登大公（德皇威廉二世的叔叔）以及各国社会名流，但均未取得实际的效果。然而，从欧洲广大的中下层犹太复国主义者那里，赫茨尔却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响应和支持。科隆热爱圣山运动领导人 大卫·沃尔夫佐恩激动地读完《犹太国》之后，马上风尘仆仆赶到维也纳拜见赫茨尔。通过沃尔夫佐恩的引见，赫茨尔认识了一大批德国热爱圣山运动的骨干，并且首次听说与自己见解不谋而合的赫斯、平斯克的著作，了解到

西奥多·赫茨尔著，肖宪译：《犹太国》，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5页。

潘光、余建华、王健：《犹太民族复兴之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

热爱圣山运动在德国、欧洲以及巴勒斯坦所展开的民族复兴事业。保加利亚、俄国和巴勒斯坦等地的热爱圣山运动协会要求赫茨尔这位“新摩西”挑起领导复国运动的重担。在索非亚，从火车站到犹太教堂，成群结队的犹太人夹道欢迎赫茨尔，亲吻他的手，称他是“以色列的心脏”，把他当作“弥赛亚”。在英国，许许多多的犹太民众自发地来到伦敦东区工人俱乐部，细心聆听赫茨尔的即席演讲。由此，赫茨尔逐渐明白，不应对上层人物寄予不切实际的希望，而应立足于发动深感失国离乡之痛的广大犹太下层百姓。他提出：“让我们立即把群众组织起来”，并决定建立一个世界性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

1897年8月29日，在赫茨尔的不懈努力下，第一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终于在瑞士巴塞尔隆重开幕。来自俄国、东欧、西欧、巴勒斯坦、阿尔及利亚和北美等11个国家和地区的204名（一说是197名）犹太复国主义者到会。这是罗马帝国灭亡犹太国家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全球性的犹太人大会。会议主持人赫茨尔在开幕词中宣布，这次会议的任务是为一座“保护犹太民族的大厦”奠基，“犹太复国主义就是犹太精神的回归”。他指出，犹太复国主义者希望恢复和弘扬犹太民族意识，改善犹太人的物质生活条件，他们所从事的是光明磊落的事业，没有必要加以掩饰。他认为，对巴勒斯坦零星的移民是“没有得到法律认可的、缓慢的办法，无助于犹太人问题的解决”，所以只有犹太人的权利得到国际承认，犹太复国主义事业才能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蓬勃发展。

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各派代表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一致通过了《巴塞尔纲领》。其主要内容有：

“犹太复国主义争取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公认的、有法律保证的家园。为达此目的，代表大会设想下列办法：

1. 有计划地鼓励犹太农业劳动者、工人和其他行业人员移居巴勒斯坦。
2. 根据所在国的法律规定，全体犹太人联合并组成地方的更大的团体。
3. 提高犹太人的自我意识和民族觉悟。
4. 为得到各国政府对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目标的赞同而进行必要的准备步骤。”

这一纲领是犹太复国主义发展史上第一部具有全球影响的历史文献，它以明确的语言和公开的方式向全世界宣布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目标。

第一次世界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是现代犹太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原先分散的、地区性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开始成为一个统一的世界性的政治运动。赫茨尔在他的日记中写到，犹太复国主义已经进入了历史潮流：“如果我用一句话给这次代表大会做总结——我应该小心，不要让它发表出去——那就是：我在巴塞尔缔造了犹太国。如果今天我把它大声说出来，大家会笑的。也许在5年后，无论如何，在50年后大家将会看到它。”从此，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便蓬勃发展起来。

沃尔特·拉克著，徐方、阎瑞松译：《犹太复国主义史》，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31页。

沃尔特·拉克著，徐方、阎瑞松译：《犹太复国主义史》，第134页。

二、罗马教廷同情犹太复国主义运动（1897 - 1917 年）

（一）“赫茨尔方案”

自从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并创立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后，赫茨尔努力为在巴勒斯坦创建一个独立实体的犹太社团创造政治和法律条件，并视之为终身奋斗目标。为了在巴勒斯坦取得特许证，他与土耳其当局谈判；为了取得欧洲大国的支持，他奔走于西欧各国首都之间，会见各国政要，向他们鼓吹自己的复国大业计划；甚至他不顾东欧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的强烈反对，奔赴俄国圣彼得堡与沙皇政府的官员讨论加速俄国犹太人移居外国的可能性。此外，赫茨尔也非常渴望拜见罗马教皇。

赫茨尔深知圣地耶路撒冷在广大基督教徒心目中的重要性以及罗马教廷在基督教世界中的影响力，为消除来自基督徒的疑虑、避免基督教世界的阻力，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必须慎重处理好圣地问题。因此，制定一个使基督教会满意的“圣地问题”解决方案至关重要。

赫茨尔在他的活动中多次阐述其对圣地问题的主张，他对圣地问题的解决方案逐渐明晰。在成书于 1895 年的《犹太国》中，赫茨尔最早涉及到圣地问题。对于如何解决圣地问题，他认为应该“按照公认的国际法，通过给予基督教圣地治外法权的地位而使它们得到保护。”同时，犹太人“将组织一支关于这些圣地的荣誉卫队，以保证他们履行在这里的责任。”1896 年初，在与奥地利记者菲利普·迈克尔·纽林斯基交谈时，赫茨尔再次提出了他的圣地问题的计划。他主张，通过圣地的治外法权化，圣地就会成为所有宗教教会的共同财产而不专属于任何势力。1896 年 5 月 19 日，在与罗马教皇使节安东尼奥·阿格列迪的会见中，赫茨尔又一次提出了圣地问题。他说，“我们将建立的不是一个君主制的国家，而是一个共和制的国家。在我们需要各大国的支持后，尤其是教皇陛下的支持：那么，我们就要自己建立它——含有耶路撒冷人所理想的治外法权化……”。

赫茨尔多次的言论体现出他解决圣地问题的主张：一、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活动不涉及到圣地；二、通过圣地的治外法权化使圣地成为所有教会的共同财产，从而达到保护基督教会利益的目的；三、为了在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犹太人必须寻求大国及罗马教会的支持。总之，赫茨尔的方案就是消除基督教世界的忧虑，论证犹太人绝不会对他们在圣地的利益构成威胁，因为犹太人根本不会介入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圣地。

尽管赫茨尔努力解释犹太人不会觊觎圣地，但其方案还是引起基督教世界的不安和反对。首先，一家耶稣会刊物在 1897 年 4 月（即巴塞尔大会召开前不久）发表了一篇对犹太复国主义憎恶的文章。“自从耶稣的那撒勒预言兑现后，1827 年的时间逝去了。这个预言说犹太人将会被毁灭……犹太人会在所有国家中被罚作奴隶，并且他们将流散于世界各

治外法权本质就是在一个国家境外司法权的延伸。它拥有一定的权利、原则和豁免权，这是由一个国家的公民、臣民或被保护人在另一国家境内所享有的、并将他们从当地管辖范围内豁免，而置其于他们自己国家的司法管理之下。西奥多·赫茨尔著，肖宪译：《犹太国》，商务印书馆 1993 年版，第 38 页。
Sergio I. Minerbi, *The Vatican and Zionism: Conflict in the Holy Land 1895-192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95.

地，直到世界末日……根据《圣经》，犹太民族必须经常过着散居的生活，在其他国家中流浪。这样，不仅通过《圣经》，而且通过他们自身的存在，犹太人可以提供对基督预言的活生生的见证。至于将会成为一个重建的以色列国中心的复兴的耶路撒冷，这是和基督本人的预言相抵触的。”这篇文章明确地反映了天主教教会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神学立场。其次，意大利和法国的报纸也报道了教皇已发出一封抗议犹太人对占领圣地图谋的通函。据《每日新闻》报道，在君士坦丁堡的教皇代表蒙西格诺·伯内提被教皇召回罗马商议“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所需采取的措施”。据说，教皇也向法国求助，因为法国是地中海东部诸岛和沿岸各国天主教徒的保护国。法国外交部长反对任何改变圣地现状的企图。早些时候，意大利报纸曾转引《罗马观察家》的文章说，梵蒂冈打算抗议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占领。对此，罗马教廷曾在《时政评论》上发出一份否认声明，“教廷没有采取任何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外交行动，并且将来也不会这样做。”虽然罗马教廷进行了“辟谣”，但是，关于梵蒂冈反犹太复国主义立场的活动仍旧在报道。《犹太编年史》报道说，教皇认为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来阻止犹太国的重建是正确的，教皇派遣了一位特使前往君士坦丁堡，让他给苏丹带去教皇的口信——告戒苏丹不要把巴勒斯坦提供给犹太人。

面对关于梵蒂冈反犹太复国主义立场的新闻报道，赫茨尔非常渴望向罗马教廷澄清犹太复国主义对圣地问题的政策。为此，他努力地争取获得同教皇会见的机会来缓解来自梵蒂冈的压力。1903年1月，赫茨尔终于先后受到罗马教廷的国务卿和教皇的接见。这是以赫茨尔为代表的犹太复国主义和以教皇为代表的天主教会之间的第一次正式遭遇。他向罗马教廷强调：犹太人绝对没有接管圣地控制权的企图；耶路撒冷和伯利恒将给予治外法权的地位，而犹太国的首都将在别的地方建立。但是，赫茨尔关于圣地的主张并没有得到教皇庇护十世和他的国务卿红衣主教德尔·维尔·梅里的认同。罗马教廷认为，他们在圣地面临着两个敌人：一个是早已控制圣地的异教徒土耳其人，另一个则是企图重新染指圣地的犹太人。由于圣地已经陷于土耳其人的控制之中，虽然天主教会对此强烈不满，也只能是承认既成事实。

（二）索可洛夫出访罗马教廷

1. 英国的圣地托管方案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列强争夺奥斯曼帝国遗产的斗争趋于白热化。战争期间，土耳其追随德意志帝国，加入同盟国一方作战。根据德军统帅部的部署，土耳其艾哈麦德·杰马尔帕夏统率第四军以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为基地攻打占领苏伊士运河的英军。这样，以英国为主的协约国集团和以德国为主同盟国集团之间在巴勒斯坦展开了激烈的军事对抗。

这场争夺对于协约国来说利益攸关：如果协约国赢得战争，其必然的结局就是瓜分奥

E.Feldblum, *The American Catholic Press and the Jewish State: 1917-1959*, New York, 1997, p.15.
ed. M.Lowenthal, *The Diaries of Theodor Herzl*, New York, 1956, p.592.
See *Jewish Chronicle*, August 17, 1897, p.21.

斯曼土耳其帝国，彼此都能从中分一杯羹。因此，他们就战后如何安排巴勒斯坦问题进行频繁的磋商。

协约国内部在圣地问题上各有利益和盘算。巴勒斯坦北部和中部习惯上被视为叙利亚的部分，传统上是法国的势力范围，他在该地区拥有对天主教的宗教保护权，法国还拥有宣布在巴勒斯坦圣地的权利。几个世纪以来，俄国利用它对东正教的宗教保护权来巩固自己在巴勒斯坦的势力存在。意大利也想利用宗教问题染指巴勒斯坦。对于英国来说，它的主要战略目标就是倾其全力确保苏伊士运河和殖民地印度之间航线的畅通，而巴勒斯坦正处于这条航线的咽喉位置，再加上大战爆发前夕中东地区石油的发现，更增加了巴勒斯坦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因此，夺取巴勒斯坦成为英国的首要战略目标。

中东战场的形势对英国不利，迫使英国做出让步。1915年春到1916年春，英国在中东战场上颇为不妙，在北部的加里波利的战役和南部的美索不达米亚战场上均遭惨败。土耳其的第四军向西奈半岛频频发动进攻，苏伊士运河受到严重的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英国不敢贸然提出独占巴勒斯坦，于是便顺应俄国的主张，提出由国际共管巴勒斯坦，以此阻止法国获得对巴勒斯坦的绝对控制权。

为了协调内部立场，协约国从1915年开始便展开了关于奥斯曼帝国未来（包括巴勒斯坦问题）的谈判。谈判首先在英、法之间进行。英方代表是马克·赛克斯，法国代表是驻贝鲁特总领事弗兰克斯·乔治·皮柯。他们经过秘密谈判后，就战后双方分割西亚达成一份协议草案。俄国以英法同意其吞并安纳托利亚东北部为交换条件也同意该协定。协定最后在1916年5月16日正式签署。这份协定称为《赛克斯—皮柯协定》，主要内容有五点：1. 黎巴嫩和叙利亚西部沿海地区以及基里基亚由法国直接占领；2. 伊拉克中部和南部以及巴勒斯坦的海法和阿克两港，由英国直接占领；3. 巴勒斯坦由国际共管；4. 在叙利亚东部、摩苏尔（合称“甲地区”）和伊拉克北部、外约旦（合称“乙地区”）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或独立的阿拉伯邦联国家；5. 甲地区和乙地区分别属于法国和英国的势力范围。英国通过该协定既缓和了其盟友法国和俄国的不满情绪，又赢得了法国一定程度的让步。以前法国始终宣称巴勒斯坦是其“大叙利亚”势力范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在这个协议中实际上放弃了这一论点。但同时作为一种妥协，英国也暂时将独占巴勒斯坦的战略意图搁置起来。

1917年上半年，战争形势对协约国集团十分不利。“（那年）对英国来说是灾难性的开始：德国是欧洲的军事主宰，法国筋疲力尽，俄国跌跌撞撞地走向毁灭，英国食物短缺，民众垂头丧气，陆军在法国与德军僵持不下，海军不再有能力对商船护航，通往东方和西方的海上交通线被德国海军潜艇部队切断。”面对严峻的战争形势，1916年12月上任的新首相劳合·乔治主张协约国应加强东线战略进攻，他认为要打败德奥同盟国集团，首先要打败土耳其军队，而这又取决于在巴勒斯坦的决定性战役的成败。新内阁执政不久就决

时任国防部外交官员，后来在1916年到1919年期间担任战时内阁秘书助理。

J.Hurewitz,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Yale University, 1975, p.62-63.

J.Kimche, *The Unromantics*, London, 1968, p.29.

定军事、外交双管齐下，迅速夺取巴勒斯坦。一方面，要求总参谋长增兵埃及，指示英军在夺取西奈半岛后，主动向巴勒斯坦发动攻势；另一方面，在外交上采取一系列步骤，加强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接触与合作，设法将法国的干扰排除。

可见，直到 1917 年 1 - 2 月，英国政府的圣地政策仍锁定为国际共管巴勒斯坦。

2.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巴勒斯坦的发展

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之前，第一次回归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浪潮“阿利亚”运动（1882—1903）就已经开始了。这次“阿利亚”运动的领导权逐渐地掌握在埃德蒙·德·罗思柴尔德男爵手中。从 1882 年到 1900 年的 18 年间，他单独经办了 7 个伊舒夫，其中艾克隆、麦图拉是他亲自筹建的。另外 5 个——里顺·锡安、齐克隆·雅可夫（及两个“女儿”移民村：贝特·舍洛莫与舍费亚）、罗什宾纳、叶苏德·哈马拉、佩塔蒂克瓦——是开拓者们自己主动创办的。当移民们缺乏外援无法生存时，很快就会得到埃德蒙·德·罗思柴尔德男爵的援助。但他对开拓者的援助是有条件的：他们须先签约，把自己买的土地移交给男爵，从而完全受其办事员的随意摆布。这种做法产生了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渐渐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助手以及助手的助手。他们利用权力，尽力遏制开拓者的独立倾向。同时，官僚机构吞食掉一大笔基金，本来这些钱是要用于伊舒夫的建设及其农业发展的。许多开拓者最初移民到此，是出于犹太复国主义的信念，打算在故乡的土地上定居，为一个生机勃勃的犹太社团打下基础。但现在也顶不住这种诱惑了，他们已习惯于游手好闲地混日子，深知不管怎样男爵总会养活他们。“男爵的恩赐泯灭了一切荣誉心和自尊心，”正如阿哈德·哈伊姆所写，“你们赎回了土地和葡萄园，但谁将赎回人民？谁将重鼓士气？”

赫茨尔去世后，一项新政策开始在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中形成。这是一项过渡性政策，目的在于把巴勒斯坦地区的政治活动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即在君士坦丁堡和其他地区的政治活动还应该继续，同时也要在巴勒斯坦进行移民开发。1908 年，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组建了巴勒斯坦办事处，并任命亚瑟·鲁宾博士为主任，具体领导巴勒斯坦的移民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在巴勒斯坦办事处的直接领导下，巴勒斯坦的犹太社团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生机盎然的犹太民族精神文化中心。

首先是伊舒夫在教育文化事业领域取得的进展引人注目。其中最明显的成果便是希伯莱语的复活。这项世界语言史上的奇迹是“文化精神派”另一代表人物本·耶胡达努力的结晶。当时巴勒斯坦犹太人中间同时存在阿拉伯语、意第绪语、拉迪诺语等，而希伯莱语只在书面使用，在口语中已经消失。但本·耶胡达认为，复兴犹太民族最重要的是恢复作

他被称为“巴勒斯坦犹太社团之父”。在那个时代，他是巴勒斯坦犹太移民农业开发的领袖。

伊舒夫（Yishuv），以色列建国前的巴勒斯坦犹太社团定居点。

哈伊姆·格瓦蒂著，何大明、何平译：《以色列移民与开发百年史》（1880-1980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62 页。

哈伊姆·格瓦蒂著，何大明、何平译：《以色列移民与开发百年史》（1880 - 1980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65 页。

为日常交际语言的希伯莱语。他从自己家庭成员开始，顽强不懈地推广希伯莱语。经过他的辛勤劳动，到1916年巴勒斯坦犹太人已有约40%把希伯莱语作为主要语言使用，犹太儿童中这一比例更高达70%。正是在本·耶胡达等人的努力下，希伯莱语和以它为基础的希伯莱文化开始牢固地扎根于巴勒斯坦。

其次，那些具有开拓精神的犹太复国主义移民们创建了“基布兹”(Kibbutz)。1900年，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机构——犹太垦殖协会接管了罗思柴尔德男爵主办的移民村，这标志着巴勒斯坦移民开发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第二次阿利亚运动(1904—1914)期间，多数犹太移民怀着在巴勒斯坦重建新型的民族之家的美好理想投身于第二次阿利亚运动。同时，一些优秀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领导人也提出了关于移民拓荒开发的新主张。鲁宾博士成功地新的犹太农业移民开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指导它摆脱官僚主义的经济，朝独立方向前进，他鼓励移民开发组织的新形式——基布兹和莫沙夫。1909年十多位青年移民与巴勒斯坦办事处订立合同，在太巴列南面民族基金会购买的一块土地上独自经营。他们将这里称为德加尼亚(Degania,意为“粮食产地”)，制定了平等的劳动分工及由集体保障成员物质需要的原则，从而创建了巴勒斯坦第一个基布兹。到1914年整个巴勒斯坦已建立11个基布兹。该时期的基布兹规模一般很小，以农业生产为主，但已确立了延续至今的基布兹基本原则：生产资料公有制；集体生产和生活；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平等的人际关系和民主管理。

具有献身精神的犹太复国主义移民所取得的这些成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不仅增强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信心，而且还赢得许多非犹太复国主义者犹太人的同情。到一战爆发时，全世界已有13万多人参加了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约占当时全球犹太人的1%，成为犹太世界中一支组织严密的政治力量。同时，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发展也提高了犹太复国主义在国际上的地位，这为他们赢得大国对其事业的支持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3.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复国主义的外交策略

一战爆发后，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关于其外交策略的趋向问题产生了分歧。一些犹太复国主义领袖早些时候就已认识到：他们在和平时期没有获得的东西很可能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得到，因为世界大战必然会导致对许多悬而未决的国际问题的重新调整。所以他们禁不住地将1913年第十三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做出的战时严守中立的决议束之高阁，试图与同盟国或协约国建立一种各取所需的战略关系。于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内部就形成了亲德和亲英两派。以弗兰茨·奥本海默为首的亲德派认为，德国发动的是一场“神圣的自卫战争”，德奥同盟国集团将赢得战争。他们与德国合作即可解救深受沙皇政府迫害的俄国犹太人，也能得到德国及其盟国土耳其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及其向巴勒斯坦移民事业的支持。以魏兹曼为首的亲英派则认为英、法等协约国将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巴勒

哈伊姆·格瓦蒂著，何大明、何平译：《以色列移民与开发百年史》(1880-1980年)，第60页。

基布兹，希伯莱语，原意是“集聚在一块”或“集体”，后来成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创立的集体定居点的代名词。

斯坦未来将划入英国的势力范围。因此，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应该与协约国合作，依靠英国实现复国理想。

为保持整个运动的中立态度，1914年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在中立国丹麦的哥本哈根召开会议，成立了以莫茨金为首的联络局，旨在使分处同盟国和协约国两大阵营中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保持联系和协调。为了在两派之间保持政策的平衡，会议决定大战期间总部仍设在柏林，但作为一种折中的办法，执委会一部分成员去君士坦丁堡负责巴勒斯坦伊舒夫的工作，索可洛夫等人则前往伦敦负责当地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因为那儿“缺乏合适的有效地在政治工作中提供帮助的工作人员”。同时，雅各布森去法国，还有些成员到美国开展工作，留在柏林的成员主要是争取德国当局对运动的支持。

大战爆发后，魏兹曼在英国与朋友们一起讨论大战给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带来的机遇。他清醒地认识到，要争取英国的支持，就一定要显示出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与英国的战略利益一致。他在1914年10月10日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的计划自然是建立在协约国将取得胜利这样一个主要的假设上，……我毫不怀疑我的看法，那就是巴勒斯坦将被划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巴勒斯坦是埃及的自然延伸，是苏伊士运河与黑海及可能来自那个方向的敌对势力之间的屏障，……如果我们的情况稍有好转，就能比较容易地在以后50年到60年中将100万犹太人移入巴勒斯坦，到那时英国将有一个有效的屏障，我们也将有一个国家。”在英国，他结识了《曼彻斯特报》主编查·斯各特和主笔赫伯特·赛德博特姆，并说服他们站在犹太复国主义一边。而后来魏兹曼有意识地利用《曼彻斯特报》积极宣传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的主张，并在这两人的帮助下广泛结交英国各界要人，组成了英国巴勒斯坦委员会。斯各特建议会见英国财政大臣劳合·乔治。劳合·乔治又建议首先与赫伯特·赛缪尔会晤。赛缪尔说“犹太复国主义梦想的实现是可能的。”他认为魏兹曼的要求“很有节制”，鼓励他“大胆”提出自己的主张，并表示其内阁同僚也很关心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魏兹曼对此话语感到很惊讶，他表示，“如果我是一个笃信宗教的犹太教信徒，我会认为弥赛亚即将来临了。”会见后，赛缪尔便给首相阿斯奎斯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建议战后英国对巴勒斯坦行使保护国权力，这使魏兹曼信心倍增。此外，在英内阁中还有魏兹曼的老朋友兼上司海军大臣贝尔福。这些人在他的影响下都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持同情或支持态度。一战爆发后，魏兹曼应劳合·乔治的邀请主持英国海军部研制新炸药的工作，他成功地发明了丙酮生产新工艺，为制造新炸药解决了关键性难题。这极大地密切了他与英国官方的联系，为他争取英国政府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支持创造了条件。尽管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英国获得了地位较高人物的同情，也有许多备忘录和会见，可是大战的第二年和第三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仍未取得显著进展。英国内阁忙于处理比巴勒斯坦更为紧迫的问题。战争仍在继续，形势并不令人乐观。1916年12月以劳合·乔治为首的战时内阁形

Isaiah Friedman, Germany Turkey Zionism 1897-1918, Transaction Publishers New Brunswick(U.S.A)and London(J.K), 1997, p.236.

Leonnard Stein, The Middle East: A History, New York, 1961, p.127.

Bernard Wasserstein, The British in Palestine: the Mandatory Government and The Arab-Jewish Conlict :1917-1929, Basil Blackwell, 1990, p.75.

成后，随着战局的发展，英国政府与犹太复国主义之间的合作才具有真正的意义。

4. 索可洛夫出访梵蒂冈

如前所述，英国新内阁为了夺取巴勒斯坦，在加大对巴勒斯坦军事攻势的同时，也加强了与犹太复国主义合作的力度。1917年2月，内阁举行会议讨论圣地问题。与会者包括赛克斯、赛缪尔、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以及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两位成员。会议决定反对共管巴勒斯坦或者巴勒斯坦国际化，赞同英国行使保护国权力；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将与英国进行合作。大会还决定由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驻伦敦代表索可洛夫到巴黎和罗马，去说服法国人和罗马教廷，缓和他们的对立情绪。

在索可洛夫到达梵蒂冈之前，赛克斯于1917年4月14日先期访问了罗马，为索可洛夫的外交行动扫平道路。赛克斯在会见教廷国务卿辖下的特殊宗教事务处的秘书帕赛尔利时，谈到“围绕巴勒斯坦耶路撒冷问题的巨大困难……天主教和东正教之间利益的冲突，另外还有不同国家对圣地所怀有的兴趣。”他还提到俄国发生二月革命后，东正教在俄国重获权力的可能性，以及俄法之间在圣地问题上恢复冲突的可能性。对此，帕赛尔利暗示说，英国作为圣地庇护人身份不符合梵蒂冈的政策，因为在圣地问题上，法国人与罗马教廷具有传统的友谊。这时，赛克斯提出了犹太复国主义这个课题，解释了它的目标和主张，并建议给索可洛夫一次会见的机会。至于圣地，赛克斯向帕赛尔利承诺犹太复国主义在那个方面没有欲望。随后，他又受到教皇接见。赛克斯结束此访后立即给索可洛夫写信，建议他拜访帕赛尔利，并争取与教皇会晤。

索可洛夫首先访问了法国和意大利，最后出访梵蒂冈，他一路上向他们表示犹太复国主义者希望由英国保护巴勒斯坦而非国际共管巴勒斯坦的愿望。

4月23日，索可洛夫到达罗马。在英国驻梵蒂冈大使德·赛利斯的帮助下，他开始了在梵蒂冈的外交行动。4月29日，索可洛夫首先拜会了帕赛尔利。在会谈中，帕赛尔利特别强调圣地的涵义问题，他希望索可洛夫能够给予详细的阐述。但是，索可洛夫对此似乎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对于圣地问题，索可洛夫除了仅仅重复在同样地点赫茨尔数年前所说的观点——犹太复国主义只是要求巴勒斯坦的世俗土地。他没有给圣地带来任何新鲜的说明。可是帕赛尔利想弄清楚对于梵蒂冈可接受的关于圣地的地理界限的划分问题。很显然，对于索可洛夫的答复，梵蒂冈是不满意的。5月1日，在同国务卿加斯帕里红衣主教进行的私人会晤中，双方涉及到许多话题：犹太人的一般状况和他们为什么需要巴勒斯坦、俄国犹太人的状况、巴勒斯坦的政治安排、圣地和天主教会关于圣地的立场、教会对犹太复国主义所追求目标的态度等。在谈到巴勒斯坦问题时，索可洛夫详细地叙述了英、法的利益。随着谈话的深入进行，索可洛夫逐渐地捕捉住如下的信息：一、在圣地，不仅英法而且意大利也拥有巨大的利益；二、教廷认为，英国在列强中是对圣地贪欲最大的国家，它在圣地的影响对罗马教廷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三、虽然罗马教廷对此极力否认，索

Sergio I. Minerbi, *The Vatican and Zionism: Conflict in the Holy Land 1895-192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07.

可洛夫依然相信，教廷已经有了一个涉及到将来会关注圣地问题的一、两个国家的很好的方案，他认为教廷会在这个事件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四、在圣地问题上，教廷的贪欲极大。它不仅索取耶路撒冷，而且还对伯利恒、杰里科以及太列巴、那撒勒斯及塔伯—那撒利斯等广大地区都有领土要求。因此，索可洛夫极力向加斯帕里红衣主教保证，犹太复国主义者对于宗教利益不感兴趣，他们不会干预这个问题，更不会涉足到这个领域；犹太人的居住地将会处于教廷所涉及的范围之外。于是，加斯帕里红衣主教表达罗马教廷的同情，并祝愿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充满成功和机会。”最后主教告诉索可洛夫，他必须拜会教皇，并再次祝他成功。

通过帕赛尔利和国务卿加斯帕里红衣主教与索可洛夫的会谈，梵蒂冈基本上摸清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关于圣地问题的主张和政策。同时，索可洛夫也对梵蒂冈在圣地问题上的意图有所了解。在此基础上，教皇迪克十五世决定召见索可洛夫，并阐明教廷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政策。在5月4日的会晤中，教皇肯定了索可洛夫来访的重要意义，他说：“为了重建家园的理想，你来到了罗马。……这是天意，上帝会促成它的。”而索可洛夫则请求教皇陛下支持犹太复国主义重建家园的理想。教皇表示，圣地问题对罗马教廷来说是很重要的。他们将会在教会和大国之间处理这个问题；教会在圣地拥有神圣的权利，它们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并得到所有政府的保护；在巴勒斯坦这个国度中，所有问题的解决都应对（天主教）宗教感情因素予以最充分的考虑。索可洛夫向教皇保证，犹太人不会亵渎他们邻居的宗教信仰，也不会触动圣地，他请求教皇陛下给予犹太复国主义事业以道义上的支持。最后，教皇以这样的话来结束会谈：“我们将会是好邻居。”教皇把这句话重复了好几次，这意味着罗马教廷表现出其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同情态度。

5. 罗马教廷同情犹太复国主义的原因

与教皇会谈后，索可洛夫向魏兹曼发出电报，表达自己外交成就的喜悦之情。他说：“教皇给了我一次长达45分钟的特别会见。教皇充满同情地谈论了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家园的努力，……当我声明我们犹太人会最严谨地尊重基督教会的教产和情感时，他说他以信的名义接受这个声明并祝愿我们的计划得以顺利执行。……我深以这次会谈为荣，这次会谈的精神本身表明它是一种积极的途径。”可以看出，梵蒂冈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保持着同情态度。

复杂的国际政治、军事和外交斗争环境，罗马教廷对巴勒斯坦的领土野心及其重返世界政治舞台的渴望，这些因素促成了罗马教廷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持同情的立场。

首先，巴勒斯坦对于罗马教廷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1870年，法国在色当战役中失败后，法国军队撤出罗马。从此，教皇国失去了法国的支持。随后，意大利军队趁机

see Sokolow(Rome) to Weizman, May 1, 1917 CZA A 18/W.

Sergio I. Minerbi, *The Vatican and Zionism: Conflict in the Holy Land 1895-192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11.

Sergio I. Minerbi, *The Vatican and Zionism: Conflict in the Holy Land 1895-1925*, p. 112.

Weizmann's cable to De Haas (New York), May 10, 1917, in Weizmann, *Letters*, Vol. 7, no. 382, p. 406.

进驻教皇领地和罗马，教皇国不复存在。教皇诅咒一切参与剥夺他世俗政权的人，并自称为“梵蒂冈之囚”。由于教皇国被消灭而产生了“罗马问题”，即宗座（指教皇）争取恢复教皇世俗权利和归还罗马的斗争。这样，教皇庇护九世及以后各任教皇，遇到适当机会就对“抢劫”罗马宗座——剥夺教皇世俗政权公开提出抗议。庇护九世的继任者利奥十三世就曾表示，“全部努力旨在达到两个目的：恢复罗马教廷过去的国际威望和对欧洲事件进程的影响；争取恢复在意大利的历史地位，在要求世俗权利方面寸步不让。”为达目的，梵蒂冈一方面努力使“罗马问题”国际化，让欧洲各国政府和世界各国的天主教组织参加他们与意大利政府的冲突中；另一方面，梵蒂冈也竭尽全力给意大利政府制造外交困难。梵蒂冈认为，每次外国首脑对罗马意大利政府的访问都是对教皇的侮辱，因为这样的访问意味着承认罗马是意大利的首都。教皇在1870年事件后宣布，梵蒂冈将不予接待到罗马访问意大利国王的信奉天主教的帝王。这给意大利政府的外交带来许多麻烦。意大利政府则针锋相对：竭力遏止梵蒂冈重返国际政治舞台的企图，不让梵蒂冈在国际关系中占据可能成为主权国的地位。1899年，在意大利政府的阻挠下，梵蒂冈参加海牙国际“和平会议”的努力付诸东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意大利在伦敦与协约国签定《伦敦条约》，其中第15款规定签约国不邀请教皇代表参加未来的和平会议。这样，梵蒂冈利用和平会议来解决“罗马问题”的设想破灭了。这种局面迫使梵蒂冈把它的目光转移到巴勒斯坦，开始考虑在巴勒斯坦的世俗统治，把它作为其在罗马统治丢失的补偿。罗马教廷对巴勒斯坦的领土要求充分表现在红衣主教与索可洛夫的会谈中。后来，红衣主教加斯帕里在与比利时大使会谈时说，教廷认为应该把圣地的管理权委托给比利时，并建立一个包括耶路撒冷、那撒勒和伯利恒等地在内的“圣地国”。

其次，英法等协约国关于圣地的协议增加了梵蒂冈扩大其在圣地权益的信心。早在1914年11月，英国就提出巴勒斯坦国际化的主张，赫伯特·赛缪尔表示巴勒斯坦应该中立，基督教朝圣者进入圣地的自由应予以保证。1915年2月5日，当他第二次与外交部长埃德华·格林讨论其计划时，格林答复说：“在国际力量的保证下，一个由欧洲大国、教皇和美国组成的委员会控制巴勒斯坦，并使其中立化，这应具有很大的可操作性。”格林接受了赛缪尔关于巴勒斯坦国际化的原则。在3月一份给内阁的备忘录草稿中，赛缪尔又提出了圣地问题。他说，为了缓解天主教会的敏感性，通过对天主教圣址建立一个国际共管体制，来确立英国对巴勒斯坦的控制；并且在一个国际委员会之下，天主教会才能被赋予他们对圣地遗址的拥有权。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个委员会中，代表天主教利益的法国或者梵蒂冈将拥有主导性的发言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早期阶段，在英国政治家关于圣地的未来构想中，梵蒂冈已经得到在巴勒斯坦占有一席之地保证。这使教皇相信他会在圣地的控制中扮演真正的角色，而《赛克斯—皮柯协定》更加强了梵蒂冈的这个印象。

最后，索可洛夫对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的目标做出了令梵蒂冈满意的解释。索克

[苏联]M.M.舍英曼，《梵蒂冈史》（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时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5-306页。
I.Friedman, 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 1914-1918, New York, 1973, p.11.
H.L.Samuel, Memoirs, London, 1945, p.143.

洛夫在梵蒂冈访问时，先后受到好几位主教的接见，其中包括帕赛尔利和加斯帕里。这些主教在会谈中最关注的是，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的目标是否会威胁到教廷在圣地的利益。当他们明确了其在巴勒斯坦的立场后，索可洛夫再三表示：犹太复国主义者不会染指圣地，只要世俗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下，教皇迪克十五世才会见索可洛夫，表达出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同情立场，并断言“我们会是好邻居”。

综上所述，教皇迪克十五世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同情的基础是：教廷准确地估计到英国会出现在巴勒斯坦，他力图利用战争中出现的对巴勒斯坦局势重新洗牌的新形势，依靠英国因素而达到其目的，借此也就排除了就圣地问题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对话的可能性。

双方对圣地问题的理解存在着巨大差异，因而教皇迪克十五世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同情的政策具有严重的脆弱性。教皇所谓的“我们会是好邻居”，根据《赛克斯—皮柯协定》，梵蒂冈在这个国际化中心地区应占有一席之地，而犹太复国主义者将被保留在临近该地的区域，即他们将被排除在这个地区之外。因此，教皇向索可洛夫做出的睦邻关系的保证，必定不是被解读为精神方面的而是地理范畴内的。反过来，索可洛夫对圣地的理解仅仅指的是该地区少数几个宗教建筑和遗址。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英国的影响力上升，犹太复国主义者遂加强了与英国的合作并取得英国的保护，梵蒂冈逐渐被排除在巴勒斯坦问题之外。在这种情况下，梵蒂冈开始实行敌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政策。

三、罗马教廷与犹太复国主义的角力（1917 - 1921 年）

（一）罗马教廷的危机感

1. 英国的动机与贝尔福宣言

1917 年是协约国和同盟国较量的关键时期。1917 年二月革命后的俄国局势动荡，虽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临时政府上台后表示要继续进行战争，但俄国广大士兵和群众的反战浪潮愈来愈高涨。到 1917 年秋季，俄国局势颇为微妙，俄国退出战争的可能性明显增大。同时英法在西线的进攻收获甚微，意大利更是在 10 月的卡波雷托战役中一败涂地，而美国虽已参战，但大批美军尚未到达欧洲。由此，英国政治家认为，要扭转战局，一定要取得中东战役的胜利，而争取犹太人的同情既有利于中东战局，又能在更大范围内推动俄国继续参战和美国的更大投入。在 10 月 31 日的内阁会议上，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先生直言不讳地说：“绝大多数的俄国和美国犹太人，与全世界犹太人一样，现在看来都同情犹太复国主义。如果我们能发表一个赞同这类理想的宣言，我们将能在俄国和美国进行非常有用的宣传。”

如前所述，与法、俄、德、奥诸列强角逐，进而夺占巴勒斯坦，是 19 世纪以来英国历届政府一贯坚持的战略目标。虽然 3 月下旬英军进攻加沙受挫，但 4 月 2 日的内阁会议否决了总参谋部退却的意见，仍然决定调兵遣将，坚决攻占巴勒斯坦。同时，魏兹曼也加

Leonard Stein,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New York, 1968, p. 105.

紧活动。1917年1月，他向英国外交部提交了一份备忘录《符合犹太复国主义目标的、犹太人迁返巴勒斯坦的计划草案》，要求英国政府尽早承认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是一个民族，赋予他们以公民的、民族的、政治的和宗教的一切自由以及购买土地和迁入的权利。4月25日，刚获悉1916年《赛克斯—皮柯协定》的魏兹曼向英国方面表示强烈不满，英国方面则再次暗示魏兹曼去发动全世界犹太人表态支持英国控制巴勒斯坦。魏兹曼与罗斯柴尔德勋爵马上电告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领导人布兰代斯，要求他召开美国犹太人代表大会并通过相应决议，为支持英国治理巴勒斯坦制造舆论。布兰代斯回电表示同意，并在后来与贝尔福会见时表示支持将来由英国保护巴勒斯坦。至此，英国政府已获得英美等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及强大的犹太社团对英国保护巴勒斯坦的坚定支持，为进一步做法国及其他国家政府的工作创造了条件，也增强了加紧军事行动的信心。1917年6月5日，英国政府决定正式任命艾伦比将军为新的埃及远征军总司令，指示他在圣诞节前拿下耶路撒冷。这一任命的前两天，外交大臣助理格雷厄姆向贝尔福提交一份备忘录：“我深切认为：我们可以满足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希望。并向他们保证陛下政府将全面同情他们的愿望的时刻已经到来。这件事可以用发出信函的形式完成，或者由贝尔福先生在某个时候安排一次会议宣布。”

一周后，魏兹曼与罗斯柴尔德勋爵拜会贝尔福，要求英国政府明确发表一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声明。7月8日，索可洛夫正式把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方面拟订的草案呈交贝尔福。在9月3日的内阁会议上，由于劳合·乔治和贝尔福均未出席，而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埃德温·蒙塔古在会议上强烈反对宣言草案，因此宣言事宜悬而未决。随后英国政府又致电美国政府，征求对发表宣言事宜的意见。9月11日，威尔逊总统的顾问豪斯上校回电说，总统认为现在还不是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表示明确态度的时机。结果宣言草案被搁置一边。不甘失败的魏兹曼与罗斯柴尔德勋爵又共同向贝尔福递交一份备忘录，敦促英国政府公开表态。10月6日，在美国犹太社团领袖的劝说下，威尔逊总统改变态度，致函劳合·乔治首相，表示美国赞同英国发表声明。于是，贝尔福委托利奥波德·埃默里起草一份宣言草案，并要他“将犹太复国主义及其批评者的一些反对意见一并考虑进去。”10月31日，英国内阁举行会议，决定以埃默里的宣言草案为蓝本发表宣言。

1917年11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以致函英国犹太复国主义领袖莱昂内尔·奥尔特·罗斯柴尔德勋爵的形式发表声明，这就是著名的贝尔福宣言。全文如下：

尊敬的罗斯柴尔德勋爵：

我代表英王陛下政府十分愉快地将下述同情犹太复国主义愿望的宣言转达给你，这个宣言已交送内阁并为内阁所批准：

“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并将尽最大努力促其实现，但必须明白理解，决不应使巴勒斯坦现有非犹太社团的公民权利和

宗教权利或其他国家内的犹太人所享有的政治地位受到损害。”

如果您将这个宣言告知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我将十分感谢。

顺致崇高的敬意

阿瑟·詹姆斯·贝尔福

1917年11月2日

这样，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政治目标在巴塞尔大会后20年、赫茨尔去世后13年终于获得了大国的承认。

通过贝尔福宣言的发表，英国政府在短期内达到了三个目标：首先，英国以将来要把巴勒斯坦交给犹太人为借口，宣称在那里建立国际共管已无必要，从而在外交上把法国势力排挤出巴勒斯坦。其次，摆出一副英国在巴勒斯坦不谋求私利、只为犹太人的民族家园着想的姿态，取得美国等协约国成员对英国控制巴勒斯坦的支持。最后，高举帮助犹太人重建家园的旗帜，赢得了全世界犹太人的支持，成功地把大多数犹太人拉到协约国一边。

在贝尔福宣言发表的同时，英国在中东战场上的军事行动也取得极大成功。1917年10月，英军占领比尔谢巴。11月1-2日，英军攻克加沙城，7日全部占领加沙地区。11月6日，英军攻陷雅法城。12月9日，也就是贝尔福宣言发表后不久，英军占领耶路撒冷，年底前杰里科相继被占。到1918年9月，英国控制了巴勒斯坦全境。

贝尔福宣言的发表和英军对巴勒斯坦全境的控制，为英国实现长期控制巴勒斯坦的战略目标创造了有利的外交氛围。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由于英国和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的积极努力，贝尔福宣言的精神基本上得到认可，并在有关中东的各项文件中得到体现。英国作为该宣言的缔造者，便顺理成章地承担起实施宣言的职责，所以它占有巴勒斯坦也就更加名正言顺了。由于法国的势力在战争中受到极大的削弱，它已无力在巴勒斯坦与英国展开强势的争夺，当英国默认其控制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权利后，法国对英国据有巴勒斯坦就不表示反对了。1920年4月圣勒摩会议正式把巴勒斯坦交由英国实行委任统治。1922年7月，国际联盟向英国颁发了委任统治书。

由于英国的成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也从与英国的合作中获益匪浅。首先，贝尔福宣言的发表，不仅使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首次获得了一个强国的正式支持，而且在不久后还赢得了几乎所有战胜国对其主张的赞许，使它得以以全球犹太人代表的身份出席巴黎和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舞台上与各大国周旋一番。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还借机统一思想，扩大队伍，大大增强了自身力量，为自身更大规模的民族复兴运动打下了基础。贝尔福宣言无疑是自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以来所取得的第一次意义深远的外交胜利，是犹太人实现返乡复国道路上的一个真正转折点。其次，英国获得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

1920年4月协约国高层会议在圣勒摩召开。会议规定，英国获得对伊拉克外约旦和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法国则获得对叙利亚、黎巴嫩的委任统治权。

使没有祖国的犹太民族近两千年来第一次有了一块为各大国所承认的可以建立“民族家园”的土地，而这块土地正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梦寐以求的“应许之地”。

2.耶路撒冷的陷落与罗马教廷的忧虑

1917年底，贝尔福宣言的发表和艾伦比将军攻陷耶路撒冷，这两件大事震惊了世界，尤其使罗马教廷感到吃惊，这促使梵蒂冈的目光转回到巴勒斯坦问题。

由于耶路撒冷的宗教敏感性，在攻陷耶路撒冷后的第二天，贝尔福就指示英国驻梵蒂冈代表德·赛利斯，要他向罗马教廷申明英国承诺保证圣地的秩序。

教廷国务卿加斯帕里主教从赛利斯那里得到英国承诺的信息后，向英国政府转达了教皇的态度：英军进入耶路撒冷，这使所有人、尤其是天主教徒感到欢欣鼓舞，因为耶路撒冷的统治权重归基督教政权手中；教皇有理由相信：英国政权会保留天主教在圣地的合法权利。但是，罗马教廷对巴勒斯坦的未来却有既定的主张。1917年12月12日，在与驻梵蒂冈的比利时使节会谈时，加斯帕里主教说，英国可能会要求保持对巴勒斯坦的控制，而他则希望圣地被置于一个国际政权——一个隶属于所有拥有大量基督教人口的国家的国际共管体制之下，还应达成一项让基督教国家都满意的关于这个政权使命的条约。“最为重要的是，这个政府首脑的最佳人选应该是一位比利时人，因为比利时人不会被怀疑对圣地具有政治野心。”梵蒂冈的目的有两个：一方面，由于参加对巴勒斯坦国际共管的都是基督教国家，作为基督世界精神领袖的教廷当然可以在这个国际共管体制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享有一定的发言权；另一方面，通过推荐比利时人做这个国际政权的首脑，教廷企图使其在圣地的影响力从宗教领域拓展到世俗领域，并利用一个国际条约使其合法化。很显然，梵蒂冈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以《赛克斯—皮柯条约》为基础的。

但是，梵蒂冈无法忽视这样的事实：在占领巴勒斯坦后，英军不仅建立了以军人为首的被占领土管理局，而且军事当局还用英文、阿拉伯文和希伯来文发布公告，恢复秩序，安定人心。英国人分明以一种主人的姿态出现在巴勒斯坦。圣地的局势急转直下。然而，在圣地从熟悉的土耳其人到英国人的这个转换过程中，梵蒂冈似乎心存很深的疑虑：英国人到底想做什么？贝尔福宣言向犹太人承诺的“民族家园”会带来什么前景？这是当时梵蒂冈主要忧虑的地方。

（二）罗马教廷与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的角力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1919年1月凡尔赛和会的召开使圣地问题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在过去，为了阻止法国得到全部控制权，英国极力要求巴勒斯坦国际化。现在，英国则力图把全部的巴勒斯坦都置于它的统治之下。为达此目的，它开始反对巴勒斯坦的国际化。

《圣经·旧约》，中国基督教协会，1996年版，第13页。

See Van Den Heuvel to Minister de Broqueville (Le Havre), December 12, 1917, no. 132, ABRE, St. Siège 1917.

1. 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的行动

为了配合英国的战略方针，犹太复国主义也加紧了在巴勒斯坦的渗透步伐。

首先，以魏兹曼为首的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团来到巴勒斯坦，建立起当地的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该委员会是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巴勒斯坦的代理机构，这个实体是未来以色列政府的雏形，具有半官方性质。委员会的目标被英国政府确定为：“在艾伦比将军当局的领导下，执行有关政府宣言的所有政策，以便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家园创造条件。”该委员会主要负责当地犹太社团与英国当局的联系，并安排战时逃离的犹太人回到家园，为大批犹太新移民的到来作好准备。

其次，1918年7月，犹太人为坐落在东耶路撒冷的斯科普斯山上的希伯莱大学举行奠基礼，魏兹曼希望希伯莱大学成为“犹太精神文明发展的中心”。

最后，犹太复国主义者努力与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达成相互妥协。1918年6月，魏兹曼在巴勒斯坦南部的亚喀巴同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之子、阿拉伯人的代表萨费尔举行了一次会晤。魏兹曼表示愿意同阿拉伯方面合作，并希望阿拉伯人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也给予支持。1919年1月初，在英国的撮合下，魏兹曼与萨费尔达成了一项相互谅解的协议，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方面表示支持建立一个以哈希姆家族为首的阿拉伯国家，并保证帮助阿拉伯人发展经济；萨费尔则表示愿意接受贝尔福宣言，同意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但由于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反对，以及后来萨费尔在叙利亚被法国打败，设想中的哈希姆阿拉伯王国没有建立起来，这项协议也就成了一纸空文。但是，无论如何，犹太复国主义者还是与阿拉伯人达成了暂时的妥协。

2. 罗马教廷在圣地问题上的应对措施

梵蒂冈密切关注着巴勒斯坦局势的变化，努力寻找应对之策。

该地区以前处于异教徒土耳其人的统治时，法国人依靠对天主教徒的宗教保护权，取得对圣地的主导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梵蒂冈在圣地重新洗牌提供了机会。它希望利用大国在巴勒斯坦的争夺，不仅能巩固自己在巴勒斯坦的传统利益，而且还能得到在此地的世俗权利。英国在战争前三年的行动，尤其是《赛克斯—皮柯协定》更激起了梵蒂冈实现其目标的希望。然而，形势的发展并未遂梵蒂冈的愿望，英国逐渐成了巴勒斯坦的事实主宰者，同时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的地位也得到加强。旧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危机又破土萌芽。战后即将召开的和平会议使圣地问题再次提上了日程。

为解决未来圣地的管理、法国的宗教保护权以及犹太复国主义的地位和角色等问题，梵蒂冈采取了一系列针对巴勒斯坦的措施：加强对圣地的管理力度，为耶路撒冷的巴拉辛纳红衣主教配备了一名副主教；频繁地与英、法、意、比利时和其他有关国家进行外交会谈，大力宣传教廷关于圣地的主张；先后派遣三位主教——英国的弗兰西斯·波恩主教、

Bernard Wasserstein, *The British in Palestine: The Mandatory Government and The Arab-Jewish Conflict, 1917-1929*, Basil Blackwell, 1991, p.25.

意大利的菲里普·尤吉斯提尼主教和法国的路易斯·杜波伊斯主教访问巴勒斯坦。

波恩主教 在巴勒斯坦对英国的犹太政策提出异议。1919 年底，他向英国首相和外交大臣写了一封信，其中写到：

“ 在这儿，犹太复国主义者宣称，犹太人将在一个英国保护体制下支配圣地，也就是说，他们要把其统治强加于一群不情愿的人身上，而他们只占其中的 10%。他们已经在各方面坚持自己权利，为他们的候选人争求官职，对行政当局进行全面干预……犹太人也宣布他们得到了教廷的支持……而这种声明是毫无根据的。整个运动的表现都与基督教感情和传统相抵触。如果他们喜欢，犹太人可以在这儿通过各种方式生活，象其他民众那样享受自由。但是，他们若是再次支配并统治这个国家，这将对基督教和上帝造成极大的伤害。而且，这种局面必定意味着犹太人的控制性影响，这种影响是德国资助的。……这难道是英国真正想得到的吗？”

由于确信贝尔福宣言使巴勒斯坦问题复杂化，这位主教认为必须做到：

“ 各阶层的人们必须和我一起对贝尔福先生的承诺和犹太复国主义的计划进行强烈的抗议……这些计划远远不止于为没有国家的犹太人建立一个家园……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并不辽阔的巴勒斯坦的欲壑难填。通过他们的新大学，他们希望犹太人会很快充实这个国家所有有利的、影响重大的位置。”

在他的信件和声明中，这位主教表达了所有天主教徒对“在巴勒斯坦的一个犹太国”憎恨的心声。他宣称，他正在以整个非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的名义讲话。波恩主教担心犹太人会试图占据所有重要的官方职位，而教皇对此也是忧虑万分。波恩主教对希伯莱大学的攻击，这至少部分说明梵蒂冈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敌意，后来，加斯帕里主教在与魏兹曼会谈时表示他最忧虑的是希伯莱大学所带来的影响，这正是这种情绪的体现。波恩主教以这种方式为教皇 1919 年 3 月的讲话准备了基调。

1919 年 1 月，巴黎和会的召开引起了天主教会的一系列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活动。1919 年 1 月，耶路撒冷的方济各会修道士伙同其他团体草拟了一份措辞强烈的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备忘录。其中写到，俄国犹太人会把布尔什维克主义带到巴勒斯坦；依地语犹太人会处于德国人的影响之下。它强调：如果一个宗教支配其他两个宗教，这是不公平的，必将导

弗朗西斯·波恩主教 (1861 - 1935): 1903 年，他被任命为威斯敏斯特大主教；1911 年，晋升为红衣主教。在一战期间，他主要活跃于那些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权利和天主教关于教育的要求有关的事务。
Sergio I. Minerbi, *The Vatican and Zionism: Conflict in the Holy Land: 1895-192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23.
Quoted in Oldmeadow, Francis Cardinal Bourne, p.173.

致反犹太主义的复活；更为重要的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不敬上帝。

在3月一次访谈中，天主教协会负责人蒙西格诺·鲍德瑞尔拉特阐述了反犹太复国主义的主张。他说：“在这个世俗世界中，我渴望犹太人得到幸福……对于他们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家园，我看不到任何反对的理由。但是，一个犹太国则具有质的区别。这对于犹太人来说是不好的，也缺乏足够的合法基础。犹太既是一个宗教，也是一个种族。如果他们成立一个国家，那么他们在各地都是异国人，他们不能渴望拥有双重国籍……”。应该说，鲍德瑞尔拉特的声明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因为他本人是加斯帕里红衣主教的密友，而且他的许多观点都被这位教廷国务卿在自己的谈话中引用。另外，天主教报纸“*The Tablet*”也展开了一场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它否认了一个广为流传的信息：即圣父是一位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者。文章声称，这是相当虚假的，并且已经被辟谣，前些日子有人试图从教皇那里获得一份对犹太复国主义建立犹太国的正式支持的声明，这是一份纯政治性的立场观点的声明，教皇已经对任何要求参加建立“犹太之家”的人提出良好的祝愿……但是，这决不适用于“一个犹太国”。

国务卿加斯帕里红衣主教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憎恶感也很强烈。1919年3月初，在罗马同来访的列恩·埃道芬·阿米提红衣主教会谈时，加斯帕里红衣主教说教廷对巴勒斯坦很担心：犹太复国主义者即将侵犯一切地方，摄取所有东西，事实上要买断巴勒斯坦。他明确指出，教廷不赞同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的计划，他们反对犹太人为自己索求或购买巴勒斯坦的土地而获得在此地的优势地位。他还引用一位英军上校的话来表达其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憎恶感：“犹太人想每年往巴勒斯坦输送相当多的犹太人数，这些人会从各国迁入，谁不了解他们的扩张野心？”国务卿加斯帕里红衣主教表示，在奥兰多（意大利首相）返回巴黎之前，他会以一种方便的方式来警告他，因为教廷得知犹太复国主义在和会上每天都在获取成功，而犹太复国主义的计划并不为所有的犹太人所接受。

可见，天主教会内外充满了一种对犹太复国主义深深的敌意。

1919年1月，和平会议召开后，被排除在和会之外的梵蒂冈密切地关注着和会关于巴勒斯坦的议题进程。由于犹太复国主义在和会上取得的成功，使梵蒂冈对巴勒斯坦未来的忧虑更加浓重了。波恩助教从巴勒斯坦返回后，他告诉教皇犹太复国主义者明确要求对巴勒斯坦的政治接管。教皇也得到巴拉辛纳的报告，他宣称无神论者、共产主义者和邪恶力量在新的犹太移民中非常猖獗。因此，梵蒂冈认为，英国会同意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要求。如果这种情况成为现实，那么教廷就会重新转向法国和意大利，并恢复宗教保护关系。为了迫使英国放弃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梵蒂冈感到必须采取行动来发出自己的声音。

1919年3月，教皇迪克十五世在宗教集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迪克十五世宣称东方教会一直是罗马教廷特别关注的目标，牢记着这个教会古老的光荣，它的先辈们不仅看

F.E.Manuel, *The Realities of American-Palestine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1949, p.222.

See *Jewish Chronicle*, March 7, 1919.

Leonard Stein,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New York, 1968, p.409.

Sergio I. Minerbi, *The Vatican and Zionism: Conflict in the Holy Land, 1895-192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27.

到东方习俗和传统的保存，而且还以极大的自豪感举行他们的仪式。现在，他们最焦虑的一件事情是：圣地的命运。他说，“谁能讲述这个故事：为把它们（圣地）从不信教者的控制下拯救出来，我们的先辈们所做的全部努力？数百年来，西方基督教徒们所流淌的鲜血和他们的英雄行为？现在，在所有善良人们的欣喜中，圣地终于重新回到基督教徒的手中。对于巴黎和会将要讨论的决议，我们的关注是最热忱的。”教皇的话锋一转，他指出，“对我们和所有忠诚的基督信徒来说，如果不信教的人（暗指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圣地被置于一个优先的、具有支配性的地位，这将是一个可怕的灾难；更糟糕的是，大多数基督教的圣殿将会被交给非基督教徒掌握。”接着，教皇又描绘了非天主教的外国人在圣地给天主教带来的苦难，“非天主教的外国人在那儿散布邪恶，他们拥有充足的资产，并从战争给巴勒斯坦造成的巨大创伤中获益。而真正令人悲哀的是：即将丧失信仰的灵魂，在基督（我们的主）为他们获得永生而献出自己鲜血的地方堕落。那些一无所有的、无助的灵魂正在向我们伸出哀求的胳膊，他们不仅向我们乞求衣食，还乞求重建他们的教堂、重开他们的学校……”。最后，教皇呼吁，全世界的天主教信徒来帮助圣地的天主教信徒。

教皇的讲话为影响巴黎和会的议程似乎安排了最适当的时机，他们为会议制定了明确的参考。因此，外交使团们以极大的兴趣遵从这些声明，这是不足为奇的。

3. 教皇迪克十五世 3 月讲话的影响

如前所述，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整个叙利亚和黎巴嫩地区历来属于法国的势力范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英国通过军事行动控制了巴勒斯坦，造成军事占领的既成事实；同时，它又凭借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要求的支持，从而能够在外交上“名正言顺”地把法国排挤出巴勒斯坦。但是，法国并不甘心失败。虽然在战争中元气大伤，但法国对叙利亚和黎巴嫩地区还仍然具有极大的传统影响，它在中东地区还享有对天主教的宗教保护权优势，并且它在巴黎和会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凭借这些王牌，法国还可以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同英国讨价还价。教皇的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演讲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英国的巴勒斯坦政策，这无疑是在列强争夺的焦点问题上火上浇油。因此，在巴黎和会上，有关各方围绕着“巴勒斯坦问题”而展开更加激烈地争夺，互不相让。

为了打破列强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僵局，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决定派代表前往中东征求“各种解决这个地区前途问题的办法的意见。”最后由两名美国代表亨利·金和查尔斯·R·克兰组成一个“金—克兰委员会”前往中东进行调查。金—克兰委员会在其提交大会的报告中说：“一个犹太民族之家”不等于将巴勒斯坦变成一个犹太国，而且如果没有极其严重地侵害巴勒斯坦现存的非犹太社团的公民权和宗教权，这样的犹太国也不可能建立起来。委员会在与犹太代表的谈话中发现，犹太人企图以各种购买手段将巴勒斯坦现有的非犹太居民几乎全部驱逐出去。报告还强调指出，实行贝尔福宣言是极不公正的，而且

Quoted in Osservatore Romano, March 14, 1919.

Bernard Wasserstein, *The British in Palestine: The Mandatory Government and The Arab-Jewish Conflict, 1917-1929*, Basil Blackwell, 1991, p.39.

犹太复国主义对巴勒斯坦所提出的要求是没有任何根据的。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常常提出的头一条要求，即他们根据两千年前对巴勒斯坦的一度占领而提出对该地拥有“主权”的主张是难于加以认真考虑的。报告得出三个结论：第一、建立犹太国不具有现实意义；第二、犹太复国主义会对巴勒斯坦的非犹太居民造成极大的伤害；第三、犹太复国主义对巴勒斯坦所提出的要求没有法理性。可以看出，具有反犹太复国主义倾向的金—克兰委员会报告深深地烙上了教皇演讲精神的印记。

（三）罗马教廷在阿以冲突中的立场

1. 巴勒斯坦委任统治政府的建立

1920年4月，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在意大利的避暑胜地圣勒摩召开会议。经过激烈的讨论，会议决定把叙利亚和黎巴嫩交由法国实行委任统治；同时把巴勒斯坦和伊拉克交由英国实行委任统治。圣勒摩会议后英国政府任命赫伯特·赛缪尔作为巴勒斯坦首任高级专员。7月1日，赫伯特·赛缪尔在巴勒斯坦宣誓就职，标志着巴勒斯坦地区委任统治的开始。

英国人在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中明显地偏袒犹太人。这表现在：

首先，巴勒斯坦委任统治政府具有浓重的“犹太”色彩。赫伯特·赛缪尔是一位英籍犹太人，曾在英国政府中担任国务大臣，是一位犹太复国主义的同情者。他的副手、主任秘书温特姆·迪兹虽不是犹太人，但却是一位犹太复国主义的同情者。监察总长诺尔曼·本特威奇是一位英籍犹太律师兼学者，也是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者。另外，耶路撒冷地区行政长官罗纳德·斯托尔斯、最高移民长官阿尔伯特·海姆森著名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还有一批英籍犹太人官吏分布在委任统治政府的各个部门。各个部门的领导人和高级专员组成政府内阁。巴勒斯坦的立法和行政权掌握在委任统治政府和高级专员手中，他们是巴勒斯坦命运的主宰，其政策走向至关重要。此外，还组织了一个咨询委员会，由10名英国官员、4名穆斯林、3名基督教徒和3名犹太人组成。1922年，巴勒斯坦的人口中穆斯林59万人，基督教徒7.3万人，犹太人8.4万人，其他民族近1万人，在总人口75.5万人中，穆斯林占78%，犹太人约占11%，穆斯林是犹太人数的7倍，但在咨询委员会中只比犹太人多1名代表。由此看来，委任统治政府倾向偏袒哪一方是很明显的。原计划还要产生一个立法委员会，但在代表比例上各方面意见分歧，未能成立。

其次，犹太人的民间组织也拥有很高的地位。犹太民族委员会是巴勒斯坦犹太人的代表，高级专员承认其为犹太社团的代表机构，管理着犹太人的日常事务并且向英国委任统治政府提出有利于犹太人的行动建议；另外，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代表着世界各地30多个犹太复国主义团体，实际上是一个影响英国巴勒斯坦政策的院外集团，其执行委员会的某些成员也在巴勒斯坦工作。犹太复国主义执行委员会被认为是一个巴勒斯坦的准政府，它奉行伦敦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所制定的政策，特别是当委任政府同犹太复

彭树智主编，杨辉著：《中东国家通史·巴勒斯坦卷》，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92页。

国主义执行委员会之间发生意见分歧时,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说服英国内阁和下院采取犹太复国主义方针方面,往往要比外交大臣或殖民大臣在争取对委任统治政府支持方面更为有效。

最后,第一任高级专员赛缪尔积极执行促进创立犹太民族之家的政策,贯彻履行《贝尔福宣言》的承诺。他先宣布允许犹太移民按每月一千人的配额进入巴勒斯坦,后来又将这一配额提高到每年 16500 人。在遭到阿拉伯人的反对后,英国当局对涉及犹太移民的政策作了一些调整(有关阿犹矛盾激化及其有关方面的反应将在后面论述),规定申请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需拥有一定数额的财产。这一新规定总体来说并没有对犹太人移入巴勒斯坦造成重大障碍,因为希望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中不少属于中产阶级,搞到几百乃至上千英镑并无困难,那些比较贫困的人则可以在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帮助下克服这一困难。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措施倒是有利于吸引犹太资本进入巴勒斯坦,并为更多犹太移民的到来奠定物质基础,也暂时缓解了阿拉伯人反对犹太人移入的激烈情绪。

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趁此良机积极采取行动支持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1920 年,它在犹太民族基金会的基础上又建立了巴勒斯坦拓殖基金会,四处筹集资金在巴勒斯坦购置大片土地以安置犹太新移民。据统计,从 1920 年到 1923 年(第三次阿利亚运动的最后一年),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新置土地约 148780 杜纳姆(巴勒斯坦的土地单位,相当于 1.4 亩)同期又有 3 万多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建立了 31 个新的定居点。这样,在整个第三次“阿利亚”期间,总共有 3 万 7 千多犹太人合法地迁入巴勒斯坦,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在巴勒斯坦短期居留后重新离开的人。

2. 巴勒斯坦地区的阿犹冲突

英国人战后的亲犹抑阿政策激化了阿犹矛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获得阿拉伯人对英国的支持,在战争最艰苦的 1915 - 1916 年间,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与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多次交换信件。英国政府答应侯赛因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的要求并且保证战争结束后立即让阿拉伯人独立。作为对这一承诺的回报,阿拉伯人发动了反对土耳其人统治的起义,给协约国的军队以大力支持,并且为最终打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英国却背叛了阿拉伯人。此外,英国的亲犹抑阿政策造成这样的局面:一方面,阿拉伯人要求独立的愿望落空;另一方面,犹太人却在英国人的偏袒之下攫取了他们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这种强烈的反差使阿拉伯人愤恨不已。因此,阿犹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对穆斯林和基督徒们来说,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支配地位是一场噩梦。”

阿拉伯人对《贝尔福宣言》非常不满。他们认为,英国“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之家”的政策会给他们造成极大的伤害,一旦犹太复国主义的资源进入这块土地,所有土地和

潘光、余建华、王健:《犹太民族复兴之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92 页。

Sergio I. Minerbi, *The Vatican and Zionism: Conflict in the Holy Land, 1895-192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25.

矿产都会落入犹太人手中，当地的阿拉伯人最终将被赶出这块土地。因此，他们需要强有力的保护，并坚决反对外国人来到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反应是两方面的：首先，把所有犹太复国主义的活动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其次，竭尽全力说服英国放弃亲犹政策。与此同时，犹太复国主义者则针锋相对：一方面，他们在伦敦发挥其相当大的影响力来阻止英国政策的转变，抵触某些由巴勒斯坦军事当局所采取的不利于犹太复国主义的行政决议；另一方面，他们积极采取措施鼓励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加紧向巴勒斯坦的渗透。这就更加刺激了阿拉伯人的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情绪，阿犹矛盾愈发突显出来。

随着阿犹矛盾的激化，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爆发了一系列的冲突。1919年1月，就在费萨尔—魏兹曼协议发表后不久，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大会发表声明拒绝该协议和贝尔福宣言。同时，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在耶路撒冷和雅法散发传单，号召阿拉伯人联合起来反对犹太复国主义。随着大批犹太新移民涌入巴勒斯坦，那里阿拉伯人的利益受到影响乃至损害，双方为争夺经济、政治权益的摩擦和冲突上升。1920年2月，耶路撒冷阿拉伯人市长穆萨·卡塞姆亲自率众上街举行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示威游行，使该地的阿犹之间的形势更加紧张。4月，在阿拉伯人的传统节日内比穆萨节（the Nebi Musa）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穆斯林朝圣者涌入耶路撒冷。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鼓动宣传下，情绪失控的阿拉伯人袭击耶路撒冷旧城的犹太居住区，结果演变成一场暴力行动。

在1920年4月事件后接替军管政府上台的英国委任统治政府比以前更加偏袒犹太人，这使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非常愤慨。1921年3月，殖民大臣温斯顿·丘吉尔访问巴勒斯坦。在其访问期间，加法和海法爆发了反犹太复国主义游行。3月28日，一个以穆萨·卡塞姆·艾尔·侯赛尼为首的代表团在耶路撒冷会见了丘吉尔。代表团向他呈交了一份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贝尔福宣言和赫伯特·赛缪尔任命的抗议书。在答复中，丘吉尔拒绝了阿拉伯人对赫伯特·赛缪尔的指控，坚持认为贝尔福宣言是“明显地正确的”，并声称，凭借在此牺牲的两千英军士兵的鲜血，英国有权决定巴勒斯坦的命运，他向阿拉伯人保证不会被赶走，敦促他们为了其共同的利益与犹太人合作。丘吉尔的答复使阿拉伯人大失所望，这种情绪进而转化为对犹太人的愤怒，使得阿犹之间的暴力冲突升级。1921年5月1日，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袭击了雅法的一个犹太移民招待所，杀死了一些在那里等待安置的犹太人，后来犹太人进行报复。在冲突中，双方共死亡95人，其中阿拉伯人48名，犹太人47名；受伤219人，其中阿拉伯人75名，犹太人146名。

雅法骚乱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代表大会向多个国家元首——包括教皇发出信件，警告圣地面临着布尔什维克的威胁：布尔什维主义之火正在吞噬着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城市，它的旗帜在我们的街头公开地飘扬，它的革命出版物在这个国家自由地传播。他们呼吁，在布尔什维主义的羽毛丰满之前，英国必须抛弃这个宣言及其政策。

雅法骚乱事件震动了中东和全世界，英国当局深感问题的严重性，开始研究应采取什

Bernard Wasserstein, *The British in Palestine: The Mandatory Government and The Arab-Jewish Conflict, 1917-1929*, Basil Blackwell, 1991, p.97.

Bentwick Norman, *The British in Palestine*, London, 1965, p.67-71.

么措施来控制日益恶化的局势。这也引起罗马教廷对圣地巴勒斯坦局势更加密切地关注。

3. 罗马教廷声援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运动

随着巴勒斯坦文职政府的建立，天主教会加强了对“犹太复国主义威胁”的关注。对于梵蒂冈来说，仅仅对犹太复国主义表示反对以及巴拉辛纳主教在巴勒斯坦高呼抗议是远远不够的。1921年5月的雅法骚乱使梵蒂冈感到，布尔什维克已经通过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渗透到巴勒斯坦，他们想在阿拉伯人中间发起一场共产主义运动，却遭到当地人的反抗。教皇迪克十五世决定向犹太复国主义发动一场公开的攻击，来声援在巴勒斯坦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1921年6月3日，教皇发表了他给主教们的训谕。在这个讲话中，教皇主要阐述了如下观点：非天主教的基督徒们正在说服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改变信仰；犹太人利用托管政府的规定正在把巴勒斯坦的基督徒们从其位置上撵走；犹太人正在把圣地改造成娱乐场所。最后，教皇呼吁大国必须保护天主教徒在国联评议巴勒斯坦未来的权利。

教皇迪克十五世在雅法骚乱后的反犹太复国主义演讲，不仅明确地表明了梵蒂冈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敌视政策，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

教皇1921年6月的“训谕”使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意识到，必须借助国际舞台来申诉其政治主张。在耶路撒冷召开的第四次全体阿拉伯人代表大会上，会议决定，“应该使用非暴力的政治手段来努力说服英国政府同意其民族主义的要求。”为达此目的，会议要选举产生一个前往伦敦游说的代表团。为了扩大其代表的广泛性，阿拉伯领导人想让基督教徒参加这个代表团。因为，宗教人士的参加能够体现出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宗教性以及把这次欧洲之行作为一场捍卫这块土地神圣性的斗争。代表团以耶路撒冷前任市长穆萨·卡兹姆·艾尔·侯塞尼为首，他们准备向英国政府的殖民大臣丘吉尔提出抗议，反对“外国犹太移民大量涌入巴勒斯坦”，反对承认希伯来语作为一种法定语言，反对第一任高级专员赫伯特·赛缪尔勋爵的“亲犹太复国主义的倾向”，以及给予平哈斯·鲁滕贝格建立一所电力公司的特许权。

在去伦敦的路上，代表团访问了梵蒂冈并获得了天主教会的支持。在那里，代表团受到罗马教廷的热情接待，他们先后得到国务卿加斯帕里红衣主教和教皇迪克十五世的接见。双方就巴勒斯坦问题交换了意见。很显然，他们就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问题取得了一致。会见后，代表团成员在罗马高度评价了教皇反犹太复国主义演讲的意义，并称赞教皇迪克十五世是“发出反犹太复国主义政策声音的第一人”。代表团要求重新发表贝尔福宣言要，建立一个向议会负责的国家政府，而这个议会由巴勒斯坦人民即穆斯林、基督徒

Bernard Wasserstein, *The British in Palestine: The Mandatory Government and The Arab-Jewish Conflict, 1917-1929*, Basil Blackwell, 1991, p.106.

Sergio I. Minerbi, *The Vatican and Zionism: Conflict in the Holy Land, 1895-192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54..

以及战前就居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选举产生。

共同的敌人——犹太复国主义使罗马教廷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走到一起来了。

4. 犹太复国主义对罗马教廷的幻想

1921年9月29日，一家意大利报纸发表了一篇关于未署名的主教的访谈评论，但它暗示这位主教是教皇的国务卿。文章指责英国的亲犹政策。在访谈中，他说为了取悦犹太复国主义，英国对其实行公开的、保护性的政策，致使法国和天主教在东方最敏感地区的利益遭到损害。他警告英国，“在圣地，英国拥有极大的权威，它的高级专员也享有不公正的权势。然而，罗马教廷也拥有致命的关系手段。例如，通过教皇的一些有利于爱尔兰共和国的活动，可以想象那种在整个说英语的世界中所产生的效果”。

这篇访谈评论引起多方关注，尤其在梵蒂冈所控制的舆论界。他们把这位主教的评论视为向犹太复国主义发起进攻的号角，因此，教廷的喉舌《罗马观察家》发表了许多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文章。他们攻击的主要矛头对准了犹太复国主义。他们说，我们不是攻击作为许多民族中一员的犹太民众，而是那些把自己视为“选民”来支配和利用“非犹太人”世界的人；教会必须把犹太复国主义与宗教间的差异区分开；文章呼吁，每一位祈祷者都要为犹太人皈依天主教而努力。在伦敦，文章报道了波恩主教的演讲，他声称每位天主教徒都应该把圣地问题牢记在心中，贝尔福宣言中的承诺必须收回。波恩主教说：“如果圣地转入否认基督的人的统治下，这会是对基督教的一个极大的耻辱。”在耶路撒冷的英国圣公会主教也强烈地反对犹太复国主义。

然而，对于梵蒂冈的反犹太复国主义宣传，犹太复国主义并没有予以针锋相对地反击。犹太复国主义报纸《巴勒斯坦周刊》转载了教皇国务卿访谈的一段主要部分的译文。这家周刊强调，“在恐吓大英帝国或重建巴勒斯坦的斗争中，这位主教不会取得成功。……主教所做的声明不会被教廷公开地批准，否则这与教皇在三年前对索可洛夫先生所说的是绝对矛盾的，而我们也不相信教皇会改变其主张。”

这家周刊的观点真实反映了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的观点。他们仍旧认为教皇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事业。1921年11月27日，第十六届犹太复国主义执行委员会会议在伦敦召开。会议讨论了犹太复国主义和梵蒂冈的关系问题。佛罗伦萨的兹维·皮瑞茨·查耶斯拉比出席了会议，他试图解释，教皇演讲的基调并不象那些出现在报刊上的摘录所臆测的那么消极。他认为，梵蒂冈会乐意接待犹太复国主义代表。按照他的观点，那位主教的访谈评论暗示着教廷对索可洛夫的一个邀请。魏兹曼认同查耶斯拉比的看法。因此，会议决定由约瑟芬·科温通知索可洛夫，并要求他写一封信或着发表一份表示维持与梵蒂冈关系的声明。

犹太复国主义执行委员竟然会把一份已经被否定了的访谈作为对其代表访问梵蒂冈的邀请，同时它。

Sergio I. Minerbi, *The Vatican and Zionism: Conflict in the Holy Land 1895-192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59.

Sergio I. Minerbi, *The Vatican and Zionism: Conflict in the Holy Land 1895-1925*, p.161.

See *Palestine Weekly*, October 7, 1921.

罗马教廷不仅通过教皇“1921年6月训谕”旗帜鲜明地表达出它的反犹太复国主义立场，而且在雅法骚乱事件后坚定地支持阿拉伯民族运动，站到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敌人一方。这足以充分证明罗马教廷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敌对态度。然而，犹太复国主义却完全忽略了梵蒂冈公开的反犹太复国主义信号，依然对罗马教廷心存幻想。究其原因，大致如下：

首先，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在理论和政策上，他们已经与罗马教廷妥善解决了圣地问题，并取得了教皇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同情。因为他们已向教皇申明：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只要求一块世俗的土地，他们对于圣地没有丝毫的欲望，并且“圣地问题”只有在巴黎和会上解决，也只能由它解决，这与犹太复国主义没有任何关系。教皇对此也曾表示，圣地问题将由教廷在教会和大国之间处理。在这个基础上，教皇对索可洛夫再三表示：“我们将会是好邻居”！

其次，巴勒斯坦的新闻审查官将教皇的“1921年6月训谕”扣押，迟迟不予公开发表，这使犹太复国主义者没能及时把握住罗马教廷对其发出的敌对信号。他们还认为教皇对犹太复国主义仍旧持支持态度，而把教会报纸的反犹宣传作为个别事件来低调处理。

最后，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直接面对的敌人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他们之间由于政治、经济权益之争而发生的冲突和摩擦愈演愈烈，阿犹双方残酷的流血冲突使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专注于巴勒斯坦的现实斗争而忽略了来自精神、宗教领域的敌人——罗马教廷。

四、罗马教廷与犹太复国主义的对决（1921—1922年）

（一）双方政策的摊牌

随着英国提交的托管制草案在国联大会辩论的日期日益迫近，犹太复国主义和罗马教廷都加紧了各自的行动。

一方面，英国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以双倍的效率开始工作以便扫清实现其目标的障碍。由于这次国联对托管制草案的批准成为一个非常真实、迫切的问题，犹太复国主义领导集团决定不遗余力地做出一切努力以确保快速通过一个对犹太复国主义没有任何损害的修正案。同时，来自罗马的信息表明，梵蒂冈对阿拉伯人的暴乱采取支持的立场。这一切促使魏兹曼决定，他必须去罗马晋见教皇，向教皇解释犹太复国主义关于圣地的立场，从而缓和教廷与犹太复国主义之间的关系，确保托管制草案的顺利通过。

另一方面，罗马教廷也增强了对托管制草案的阻击力度。虽然新教皇庇护十一世刚上任不久，但因为教皇国务卿还是由加斯帕里红衣主教继续担任，所以教廷仍然执行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政策。罗马教廷认为，英国的托管制草案将在巴勒斯坦给予犹太人以优势地位，进而损害天主教在圣地的权益。

1922年4月2日，魏兹曼与加斯帕里主教会晤。在会谈期间，魏兹曼获悉教廷已向

1922年1月22日，教皇迪克十五世去世，艾奇利·莱迪红衣主教继任为教皇，这就是庇护十一世。

国联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中表明了梵蒂冈对巴勒斯坦托管制草案三个条款的反对：(1) 第 2 条款，关于宗教权利的保护；(2) 第 4 条款，关于一家犹太公司的建立；(3) 第 14 条款，关于圣地委员会的建立。加斯帕里主教对这些作为草案的条款内容表示抗议，尤其是第 14 条款。他说，罗马教廷决不同意由英国选出的代表来处理天主教的利益。他进一步说，“对于那些由不同宗教的信徒以特别崇敬的心情来看待的地方，草案没有说明要做什么……在这个由所有宗教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内部本身唯一的最大可能就是：会引起一个剧烈的冲突……这样就阻碍了任何冷静判断的可能性”。正是在这次会谈中，魏兹曼第一次发现梵蒂冈对托管草案的反对立场，特别是对关于它的犹太复国主义条款。

与加斯帕里主教会晤后，魏兹曼对罗马教廷并没有完全失望。在魏兹曼会见加斯帕里主教前，德·赛利斯给了他一份教皇迪克十五世 1921 年 6 月训谕的英译稿。据此，魏兹曼了解到前教皇的反犹太复国主义立场，但他仍然对新教皇抱有很大的期望。因此，魏兹曼非常渴望晋见教皇庇护十一世。他认为，如果不能成功地为他安排一次与教皇的会晤，这将是教皇对犹太复国主义实行敌视政策的信号。德·赛利斯两次向教皇国务卿提出这件事，要求他对此做出答复。经过赛利斯的努力交涉，加斯帕里主教承诺，在魏兹曼从卡普里度假返回后，他会同魏兹曼进行第二次会晤。

在与加斯帕里主教第二次会晤中，魏兹曼最终摸清了罗马教廷的底线。在与教皇国务卿交谈中，魏兹曼发现，梵蒂冈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忧虑在于它担心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的文化教育活动会威胁到它在该领域的传统地位。除了圣地问题，梵蒂冈在巴勒斯坦的利益主要涉及到道德和思想价值。在这个领域，梵蒂冈尚未消除它的老对手新教的威胁，现在它又不得不面临着希伯来大学的一个新的精神挑战。在会谈中，加斯帕里主教用法文说的一句话最为经典：“我所恐惧的是你们的大学”，这也真实反映了罗马教廷的心态。梵蒂冈对此采取的外交策略是，对于罗马教廷所关注的巴勒斯坦事务，它主要向英国当局交涉，而犹太复国主义只能置身于局外旁观。教廷认为，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是以某种模糊的形式作为巴勒斯坦政府的一个分支，在有必要的时候，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会发挥其强大的影响力。

经过两次与加斯帕里主教的会谈，魏兹曼深深地感觉到这位教皇国务卿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敌意。从此两者之间围绕着“托管制草案问题”在国联这座舞台上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二) 双方围绕“托管制草案”而展开的斗争

1. 罗马教廷获得初步的胜利

为了扫除托管制计划在日内瓦国联会议上得以顺利通过的障碍，犹太复国主义者全力以赴地进行外交活动。与此同时，梵蒂冈则致力挫败这个计划，或至少使有关犹太复国主义的条款得到根本性的修改。

Sergio I. Minerbi, *The Vatican and Zionism: Conflict in the Holy Land 1895-192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64.

Weizmann, *Trial and Error*, Philadelphia, 1949, vol.2, P.285-286.

随着国联大会对托管巴勒斯坦批准的辩论日期的临近，梵蒂冈加大了对托管制草案的阻挠力度，增强了其阻击国联批准托管制的斗争：

首先，在 1922 年 5 月 13 日，即国联大会来临之前，教廷派遣巴拉辛纳主教前往欧洲，宣传天主教反对“犹太人—东正教—新教占领圣地”的危险主张。5 月 11 日，在动身去伦敦之前，他在罗马发表了一次演讲，严厉地攻击犹太复国主义和英国的巴勒斯坦当局。在演讲中，巴拉辛纳号召捍卫天主教对圣地的权利，帮助天主教学校。他说英国企图分化巴勒斯坦的天主教徒，他们通过取悦天主教会使其不与罗马教廷密切合作。因此，梵蒂冈担心，英军对巴勒斯坦的征服和得到委任托管权，这很可能有助于英国圣公教与东正教结盟（这两个宗教都是天主教的主要竞争对手），而英国会取代俄国成为东正教的保护者。他还认为，英国试图通过帮助东正教教士来降低意大利和法国在中东的影响力。英国政府的对此予以明确否认。在议会对这个问题进行答复时，英国副殖民大臣艾德瓦德·伍德·哈里发科斯说，绝对不会发生诸如天主教以前所享有的权利被终止或者遭到侵害这类事，巴拉辛纳主教的指控是荒谬的。在这种情况下，外交大臣贝尔福和殖民大臣丘吉尔都拒绝接见巴拉辛纳主教。后者的伦敦之行遭到了失败。

此后，梵蒂冈决定将其主张以书面形式由国务卿加斯帕里主教呈送给国联秘书长。1922 年 5 月 15 日，加斯帕里主教向国联提交了一份外交照会，这份照会在许多年后仍作为梵蒂冈在巴勒斯坦政策的基础。在照会中，加斯帕里主教说，草案的第 14 条款提议所有宗教的代表都出席圣地委员会，但它没有说明出席的比例，天主教利益不是由适当部门所选出的代表来处理，对此，罗马教廷不会同意。由于第 14 条款存在诸多缺陷，罗马教廷无法接受。梵蒂冈希望，圣地委员会成员应该由那些在圣地的使节组成，所谓的大国必须同时又是国联成员。

与此同时，罗马教廷对它具有重要影响的许多天主教国家进行频繁的外交活动，并利用他们来左右巴黎和会关于托管制辩论的进程。这些国家不仅有法国和意大利，而且还包括西班牙、波兰、巴西和比利时。

由于这么多来自梵蒂冈的压力，托管制草案在 5 月的国联大会上没有获得通过，有关托管地的决议则被推迟到 7 月会议。在与犹太复国主义的较量中，罗马教廷获得了初步的胜利。魏兹曼感慨地说：“我们的敌人——特别是梵蒂冈……正在疯狂地阻击我们。”

犹太复国主义在与教廷的第一回合的角力中遭到挫败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首先，以法国为首的天主教国家不甘心其势力退出巴勒斯坦。作为“天主教长女”的法国在巴勒斯坦具有传统的利益，享有对天主教保护权地位，在英国控制巴勒斯坦之前，这里一直是法国的势力范围。虽然圣勒摩会议划分了英法在原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地区的势力范围，法国人不甘心其在巴勒斯坦的失败，它企图利用基督教在圣地问题上的争议挽回其颜面，至少可以与英国在其他利益的争执上，作为一个讨价还价的重要筹码。其他天主教国家如意大利等国也都想在圣地之争中分一杯羹。在这个问题上，罗马教廷的活动整合了这些反对

See Weizmann(Geneva) to his wife(London),May 12, 1922, in Weizmann, Letters, vol.11, no.97, p.93.

力量，从而使之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对英国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潮流。其次，罗马教廷的外交活动给英国政府制造了极大的压力，而且也使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英国遭遇到一个严重的倒退。6月21日，英国上议院提出一个动议，这个议案宣称，依据目前的形势，对巴勒斯坦的托管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直接违背了女王陛下政府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誓约，是对巴勒斯坦大多数人的情感和愿望的背弃。魏兹曼对此很清楚，梵蒂冈和阿拉伯人正在致力摧毁贝尔福宣言和整个“民族之家”政策，他很担心梵蒂冈会“有能力促使所有天主教国家一致反对英国。”

尽管罗马教廷有效地阻击了托管制草案在国联大会的批准进程，但是矛盾并没有解决，双方又为下一步的斗争厉兵秣马。

2. 双方第二回合的较量

按照议事日程，1922年7月的国联理事会议即将通过托管制草案。随着这次会议的临近，梵蒂冈加强了它的活动。6月4日，梵蒂冈又向国联大会发出一份外交备忘录，它与5月15日国务卿的便函略有不同，它调整了斗争策略：避开英国，把攻击矛头直接对准犹太复国主义，缩小了打击面。这份备忘录立即得到了广泛的宣传。在备忘录中，教廷首先强调，它不反对授予英国巴勒斯坦托管权的决议；对于每个关于犹太人的条款，它强调天主教徒是不公平待遇的牺牲品。另外，梵蒂冈也与巴西政府进行接触，请求它支持任命比利时天主教徒米勒斯·凡·迪斯·赫尤维尔为圣地委员会主席。与此同时，梵蒂冈控制下的报刊也开足马力进行反犹太复国主义的舆论宣传。1922年6月30日，《罗马观察家》报发表了加斯帕里主教于5月5日向国联提交的巴勒斯坦问题备忘录的正式原文。备忘录声称，犹太复国主义者作为一个统治分子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会打乱巴勒斯坦的社会稳定、践踏当地人的权利。报纸写道，国联对这份备忘录非常重视，因为它忠实地表达了全世界基督教徒的主张。天主教的公众意识已经被唤醒了。“为达此目标，他们会成立一个天主教的国际机构，这个机构能够联合全世界所有的天主教徒以保卫圣地、反对巴勒斯坦的布尔什维主义的犹太人。”

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想方设法采取各种措施粉碎梵蒂冈对英国提出的托管制草案所设置的重重障碍。针对梵蒂冈煽动出席国联理事会的天主教国家（包括巴西）阻止托管制草案在大会上获得通过的行动，犹太复国主义执委会决定在7月15日举行一次特别会议来讨论托管制。因此，犹太复国主义执委会最终决定要求耶胡达·纳萨·维纶斯基在巴西进行公关活动，力争说服巴西政府指示它在国联的代表投票支持通过托管制草案。当时，维纶斯基是一名土地基金会（the Keren Hayesod）在拉美的资金筹措委员会的专使。

与此同时，犹太复国主义的喉舌《巴勒斯坦周刊》对巴拉辛纳主教的欧洲之行展开激烈的批评。这家刊物说，每位负责任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都坚信犹太复国主义在圣地没有直接的利益，并准备离开有关利益国家的犹太定居点。所以，耶路撒冷红衣主教巴拉辛

See Weizmann(London) to Deeds(Jerusalem), June 9, 1922, in Weizmann, Letters, Vol. 11,no.135, p.128.

纳广泛宣传的报告——关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意图和巴勒斯坦当局的态度——是不公正的、恶毒的。这家周刊认为，巴拉辛纳主教在罗马做出了一次与其身份不符的演说。周刊指出，巴拉辛纳在罗马演说中所做的声明——天主教徒拥有与犹太公司同样的权利——是一个低级的错误。正如所有大国所承认的那样，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利益主要是民族性的，只有间接的宗教利益，相反，罗马教会的则是绝对的宗教利益。犹太复国主义力图通过舆论宣传捍卫犹太复国主义事业以遏止教廷对它的攻击。

此外，魏兹曼也通过其他渠道来探明罗马教廷的真正企图。他要求安格罗·杜纳逊（一位在意大利定居的富裕的犹太人）与梵蒂冈代表农西奥·博纳旺图拉·塞雷提接触，以便从他那里获得一个对梵蒂冈要求的准确解释。7月17日，魏兹曼亲自会见了与巴拉辛纳主教有隔阂的教皇使节塞雷提。通过交谈，魏兹曼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如果梵蒂冈对圣地委员会感到满意的话，它就会对其他的事（指犹太复国主义）放行。塞雷提告诉他，一旦托管制事件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梵蒂冈和犹太复国主义之间就会出现一个缓和的局面，而他会安排魏兹曼与教皇的会晤。

最后，魏兹曼还敦促伯纳德·罗森布莱特（一位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设法说服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发布一份针对攻击犹太复国主义的强烈抗议。“总而言之，就是向梵蒂冈坚决而平和地说一句话，表达出犹太复国主义建立巴勒斯坦的决心而不触犯梵蒂冈。”

梵蒂冈在天主教国家中进行反犹太复国主义的鼓动，不仅给英国政府造成巨大的压力，而且也使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英国遭遇到严重的倒退。如上所述，6月21日，英国上议院提出一个动议宣称，依据目前的形势，对巴勒斯坦的托管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直接违背了女王陛下政府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誓约，是对巴勒斯坦大多数人的情感和愿望的背弃。

魏兹曼在他的一封信中写道，梵蒂冈是所有黑暗力量的领袖，它正在努力把这股力量组织成一个反犹太主义和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魏兹曼的话代表了当时大多数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的心声。

3. 英国政府的外交出击

进入7月后，托管制草案是否能在国联大会得以通过已经处于最后的冲刺阶段。犹太复国主义和梵蒂冈双方都为各自的目的而全力以赴。这时，英国政府不仅顶住了来自国内外的政治压力，而且在7月1日采取了两项重大措施以确保托管制草案的顺利通过。

其一，英国政府给国联秘书长发出一份照会作为对加斯帕里主教给国联信件的答复。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地位问题，根据托管制草案第4条款，照会指出，英国殖民大臣已经宣布这种特殊地位并不含有任何行政职能；更确切地说，它是根据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而采取的措施，以便促进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帮助这个国家全面地发展，但英国政府没

See Palestine Weekly, June 9, 1922.

Sergio I. Minerbi, *The Vatican and Zionism: Conflict in the Holy Land 1895-192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84.

有在托管政府中给它任何部分。犹太移民和他们的居住地只是为在巴勒斯坦的犹太民众的民族家园而建立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由托管政府和犹太民族之家一起管理。定居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需要根据托管制第 7 条款来获得巴勒斯坦的公民权，这是为了防止加斯帕里主教所说具有倾向性的歧视现象出现。在这位主教看来，第 11 条款就是犹太人与其他民族相比而获得的一个优势地位的证据，而英国政府认为，与英国获得委任统治权一样，犹太公司在公共事业、服务业和自然资源开发方面参与的可能性仅仅是对它在巴勒斯坦产生的特殊形势的一种合法的承认而已。这是犹太人为了巴勒斯坦所有居民的福祉，他们凭借自己的财富和自身的努力而投身于这个国家发展事业的最好的证明。

其二，殖民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发表了一份白皮书，表明了英国对巴勒斯坦的新政策。白皮书声称，委任统治政府继续执行贝尔福宣言，但无意使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的语言和文化消失或者使其处于从属地位；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是“出于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默许”；犹太移民无论如何不能超过国家经济所承受的程度。白皮书还声明，英国不打算将整个国家改变成一个犹太民族之家，因为这是根本行不通的，还保留所有宗教团体都有向国联申诉的权利。白皮书还建议成立一个立法委员会。拟议成立的立法委员会由 10 名英国官员和 12 名非官员组成，其中穆斯林代表 8 名、基督教和犹太人各 2 名。以魏兹曼为首的犹太复国主义接受了丘吉尔白皮书，并且向英国保证，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活动将遵循英国的政策行事。他还强调，犹太复国主义者理解移民入境必须按巴勒斯坦经济能力加以控制。

通过对贝尔福宣言和巴勒斯坦政策的辩护，英国政府一方面向国际社会、尤其是向罗马教廷宣传了自己的立场，化解了反对托管制草案的阻力；另一方面也向世界证明了其扶植犹太复国主义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罗马教廷和犹太复国主义双方的角力正处于胶着状态时，英国政府的行动打开了僵局，从而使胜利的天平逐渐地偏向于犹太复国主义一方。

4. 罗马教廷的失败

1922 年 7 月 17 日，国联大会在伦敦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讨论托管制草案问题。

会议上，各大国之间围绕着托管制草案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法国代表首先发难，他声称：新圣地委员会可能被授权改变圣地的现状而对天主教的利益造成伤害，因此，“确保委员会没有能力改变 1852 年以来圣地的现状”是非常必要的，换言之，法国要求保持圣地的国际化特征。贝尔福回答说，英国政府从没有以一个全新的政权来取代现状的意图，委员会的决议也只涉及到现在的问题；但它要求不要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委员会，这样会使托管国一方产生一种至高无上的行政权。贝尔福暗示法国代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委任

Bernard Wasserstein, *The British in Palestine: The Mandatory Government and The Arab-Jewish Conflict, 1917-1929*, Basil Blackwell, 1991, p. 120.

Sergio I. Minerbi, *The Vatican and Zionism: Conflict in the Holy Land 1895-192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76.

统治权是同呼吸共命运的。这使法国和英国的委任统治命运捆绑在一起。意大利代表也紧随其后提出，委员会应该由那些在这个国家中拥有重大利益的天主教国家代表组成。贝尔福则引用“英国给国联秘书长的7月1日照会”来予以反击：任何在巴勒斯坦拥有利益的大国和三大宗教都不能在委员会拥有代表。他也指出，国联大会批准对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规定他们同时派驻军队，并在一段时期内保留第14条款。同时他强调，在此之前，必须修改这个条款，必须维持圣地现状。经过有关各方的激烈争论，7月22日，大会终于形成决议，批准了一份简略的第14条款版本。这个版本把圣地委员会的任命方法、组成和职能问题留在将来由大会审议并批准。

由此可见，关于托管制草案的辩论主要在大国之间进行。虽然驻巴黎的教皇使节蒙西格诺·赛利提主教已经来到伦敦准备向大会解释梵蒂冈的立场，但是大会没有邀请他出席见证。也就是说，罗马教廷已经被排斥在巴黎和会之外。在国际舞台上，教廷只能借助其对天主教国家的影响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在与犹太复国主义的对决中，罗马教廷把取胜的筹码都压在它对天主教国家的影响力上。事实上，教廷所倚重的天主教国家，尤其是法国已经与英国达成分享战利品的协议，对他们来说，梵蒂冈所代表的宗教旗帜已成昔日黄花。他们对罗马教廷的态度随之改变。因此，在关于托管制草案辩论的最后时刻，当教廷特使蒙西格诺·赛利提主教再次努力尝试推迟批准委任统治权——他要求允许梵蒂冈提交一份重要文件的时候，没有任何人理睬他的要求。魏兹曼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当自己正坐在法国代表在伦敦旅馆的房间中时，蒙西格诺·赛利提主教走进房间，请求法国代表提供帮助以便使这个计划推迟。法国大使则推诿说：“这事得由魏兹曼决定。”而赛利提主教则气愤地在房间中来回走动。

7月24日，国联大会正式通过了对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委任统治权。规定英国对巴勒斯坦、外约旦和伊拉克实行委任统治。大会还向英国政府颁发了委任统治书。国联委任统治书还根据《贝尔福宣言》的精神，明确规定英国委任统治当局应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要求它“为犹太移民入境提供便利”。同时国联也规定，关于建立犹太民族家园不适用于约旦河以东的地区。

5. 罗马教廷失败的原因

数千年来，巴勒斯坦由于它所占据的重要的战略位置以及作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圣地而引起各种势力的觊觎。为了维护自己在圣地的利益，基督教不仅同其他各种势力做斗争，而且基督教内部也因利益的分歧而纷争不息。宗教利益往往又与大国利益交织在一起，因此，圣地之争所展现出的矛盾错综复杂。就这样，罗马教廷小心地应对着各种力量的挑战，奋力维护自己在圣地的传统利益。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与新兴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冲突中，罗马教廷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遭到惨败。这是因为：

第一，犹太复国主义成功地将自身利益与英国在巴勒斯坦的扩张战略结合在一起。在

Sergio I. Minerbi, *The Vatican and Zionism: Conflict in the Holy Land 1895-192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77.

赫茨尔的《犹太国》中明确指出，大国的支持是立国的必要条件。巴塞尔会议后，赫茨尔就到当时的各主要欧洲大国游说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寻找后台和靠山，在他于 1904 年去世前，均未能获得明确而有效的支持。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情况才出现转机。以魏兹曼为代表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务实派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全力争取英国的支持。同时，英国也发现自己控制巴勒斯坦的战略意图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政治目标存在着并行不悖的共同利益，双方一拍即合，各取所需，终于促成了贝尔福宣言的发表，使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的目标首次获得大国的支持。因此，无论是贝尔福宣言，还是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都是英国和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共同利益的政治保障。而罗马教廷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也就直接冲击了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利益。从这个层面上说，罗马教廷在圣地所面对的还有英国这个强大的敌人。双方的力量对比如此悬殊，胜负结果也就不言而喻了。

第二，与意大利的矛盾使罗马教廷在国际舞台上丧失了发言权。如前所述，“罗马问题”使罗马教廷与意大利的关系非常紧张，甚至达到水火不容的地步。一方面，梵蒂冈努力使“罗马问题”国际化，让欧洲各国政府和世界各国的天主教组织参加他们与意大利政府的冲突中；另一方面，梵蒂冈也竭尽全力给意大利政府制造外交困难。意大利政府则针锋相对：竭力扼杀梵蒂冈重返国际政治舞台的企图，不让梵蒂冈在国际关系中占据可能使它成为主权国的地位。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意大利在伦敦与协约国签定了《伦敦条约》，其中第 15 条款规定签约国不邀请教皇代表参加未来的和平会议。意大利以此作为它参战的条件。因此，当战胜的协约国在战后处理圣地问题时，作为圣地问题的主要当事人之一的罗马教廷却被排除在巴黎和会之外，丧失了对圣地问题的发言权。与此相反，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代表却出席了协约国最高委员会会议，并对巴勒斯坦的未来提出了自己的纲领，与英国代表一起磋商委任统治书的条文。犹太复国主义者几乎达到了他们所有的目的。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与犹太复国主义诸多优势条件相比，罗马教廷焉能不败？

第三、罗马教廷被大国间的游戏规则所淘汰。数百年来，享有“天主教长女”之誉的法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密切。从 16 世纪开始，它就拥有了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对天主教的保护权，并利用这种保护权来维持其在巴勒斯坦的势力存在。为了反对英国对圣地的控制，它就祭起罗马教廷这面宗教旗帜，把自己扮成天主教利益的保护者，代表象教皇这么令人敬重的精神领袖行事。在与英国的讨价还价中，一旦它的利益要求得到满足时，法国也就不顾罗马教廷的利益，也对英国独霸巴勒斯坦不再表示反对了。在大国间的游戏规则中，罗马教廷只是他们彼此讨价还价、压制对手的筹码和工具，一旦失去了利用价值，被大国抛弃就势所必然了。从这方面说，罗马教廷事实上成为大国争霸的牺牲品。

总而言之，在罗马教廷与犹太复国主义的冲突过程中，犹太复国主义抓住历史机遇，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依靠英国的坚定支持而获得了发展；罗马教廷则由于列强之间的争夺而被排挤出国际政治舞台之外，它的国际影响力从此更加衰弱了。

结 语

历史的轮回使天主教再一次站在犹太人的对立面。在犹太人掀起的复国运动中，罗马教廷顽强地阻击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发展。罗马教廷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敌视政策首先是建立在神学基础上的。它认为，作为杀害基督耶稣的刽子手、违背自己誓言的罪恶的民族，流散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是上帝预言的见证人，他们必须遭受惩罚。因此犹太人重返圣地巴勒斯坦是不允许的。其次，罗马教廷在圣地巴勒斯坦的最大利益是保卫自己在圣地的天主教权益。而犹太复国主义“返回锡安山，重建家园”的目标极大地冲击了教廷在圣地的利益。最后，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双方都看到战争为在巴勒斯坦重新洗牌提供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他们都为各自的目标而展开激烈的争夺。

自从巴塞尔大会后，犹太复国主义者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复国事业中。一方面，他们成立巴勒斯坦办事处，组织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在巴勒斯坦进行垦殖事业，加强对该地的渗透。经过具有献身精神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艰苦努力，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他们已经把巴勒斯坦建设成为一个犹太民族的精神和文化中心。另一方面，他们积极奔走于西方列强中间寻求大国对其事业的支持。以魏兹曼为首的犹太复国主义“务实派”成功地将其复国目标与英国在巴勒斯坦的战略意图捆绑在一起，从而赢得了英国的坚定支持。从此，“贝尔福宣言”的精神和犹太复国主义的主张得到了世界各大国的承认。

罗马教廷不仅要维护自己在圣地的传统利益，而且还有更大的目标。它企图利用列强在巴勒斯坦的矛盾与纷争使圣地的中心地区国际化，进而藉此实现教廷对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其他地区的世俗统治。教皇还希望教廷会被邀请参加战后的和平会议并在新的国际秩序安排中充分施加它的政治与宗教影响。

贝尔福宣言和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军事控制使圣地的局势急转直下。贝尔福宣言为犹太复国主义“重建民族家园”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法律基础，而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军事占领则使其目标的实现更具有现实性。随着英国在巴勒斯坦委任统治的实施，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地位与影响与日俱增。这不仅威胁到罗马教廷的既得利益，而且使它在圣地的野心也化为泡影。

由于无力对抗强大的英国，罗马教廷便把矛头集中于犹太复国主义。双方围绕着托管制草案问题展开了激烈斗争。但是，由于法国等与英国达成瓜分战利品的协议，在双方斗争的关键时刻，他们放弃了对罗马教廷的支持。于是，罗马教廷在国际社会中因势单力孤而无力回天。

总之，在圣地问题上，与罗马教廷争夺中，犹太人利用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列强之间的矛盾而战胜对手，从此在巴勒斯坦站稳脚跟，逐步地发展强大起来，为日后的立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什么一个近两千年没有自己的国土而流散全世界的民族不仅能顽强地生存下来，而且经过坚韧不拔的奋斗最终重建国家、再度崛起？本文给出了一个主要答案。

在犹太人的复国历程中，他们遭遇到了无数次的艰难险阻，而这段时期的斗争只是其中的一朵浪花。通过对这段历史的透析，我们可以了解到现代犹太人思想风貌的根源，正如西方学者基尔凯戈尔所说的一句话：“生活始终朝着未来，而悟性则经常向着过去。”

参 考 文 献

中文资料:

1. 阿巴·埃班：《犹太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2. 哈伊姆·格瓦蒂著，何大明、何平译：《以色列移民与开发百年史》（1880-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3. 彭树智主编：《阿拉伯国家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4. 潘光、余建华、王健：《犹太民族复兴之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1998年版。
5. 彭树智主编，杨辉著：《中东国家通史·巴勒斯坦卷》，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6. [苏]M. M. 舍英曼，《梵蒂冈史》（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时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7. 《圣经·旧约》，中国基督教协会，1996年版。
8. [苏]B. II. 波将金：《外交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79年版。
9. 西奥多·赫茨尔著，肖宪译，《犹太国》，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10. 沃尔特·拉克著，徐方、阎瑞松译：《犹太复国主义史》，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

外文资料：

1. Bernard Wasserstein, The British in Palestine: the Mandatory Government and The Arab-Jewish Conflict 1917-1929, Basil Blackwell, 1990.
2. Bentwick Norman, The British in Palestine, London, 1965.
3. Doreen Ingrams, Palestine Papers 1917-1922, London, 1972.
4. David Vital, The Origins of Zionism, Oxford, 1980.
5. E. Feldblum, The American Catholic Press and the Jewish State: 1917—1959, New York, 1997.
6. H.L. Samuel, Memoirs, London, 1945.
7. I. Friedman, 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 1914-1918, New York, 1973.
8. Isaiah Friedman, Germany Turkey Zionism: 1897-1918, Transaction Publishers, New Brunswick (U.S.A) and London (U.K) 1998.
9. J. Kimche, The Unromantics, London, 1968.
10. J. Hurewitz,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Yale University, 1975.
11. Leonard Stein, The Middle East: A History, New York, 1961.
12. Leonard Stein,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New York, 1968.
13. M. Lowenthal, The Diaries of Theodor Herzl, New York, 1956.
14. M. Harel, "The Jewish Presence in Jerusalem Throughout the Ages," in Jerusalem, New York, 1974.
15. R. Bachi, The Population of Israel, Jerusalem, 1977.
16. Sergio I. Minerbi, The Vatican and Zionism: Conflict in the Holy Land 1895-192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17. Weizmann, Trial and Error,Philadelphia 1949,vol.2.

18.Weizmann' s cable to De Haas(New York), May10, 1917, i n Wei zmann, Letters, Vol . 7,
no. 382.

后 记

随着论文写作接近尾声，在桂林的求学生活即将结束。

感谢罗老师这三年的谆谆教导。在传道授业的过程中，他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他那严谨的治学态度，高尚的师德以及渊博的学识令我折服，使我对“为人师表”的含义产生了更深层的感悟。本文从选题到材料的搜集，从写作修改到定稿，导师都给予耐心细致的指导。这些都使我受益终生。对导师三年来的关心教诲，我深表谢意！此外，谌焕义老师、傅世明老师、张坚老师等对本文的写作也提供了宝贵的建议。为此，向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

于禄卿、刘俊、唐彪、郭俊超等师友以及诸位师弟师妹对本文的写作所提供的帮助和支持，其情其景，恍如昨日，历历影现。这种同窗之谊是我的宝贵财富，我将倍加珍惜。

最后，我还要对我的亲人表示感谢。他们在老家辛勤劳作，为我提供物质支持，还帮我抚育儿子，使我解除了后顾之忧。没有他们的支持，这三年的求学生活是无法想象的。

我的感恩之情用语言是无法表达的，祝愿他们都得福！

郑玉珠

2007年4月15日书于桂林

作者: [郑玉珠](#)
学位授予单位: [广西师范大学](#)

相似文献(1条)

1. 期刊论文 [徐光源. 曾强. Xu Liyuan. Zeng Qiang 罗马天主教中的传统主义 -国际资料信息2005, "" \(11\)](#)

1962-1965年期间召开的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以下简称“梵二”)导致罗马天主教内部出现严重的分裂,传统主义者指责教廷“变节”和“不公正”,已经向“自由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投降,并且正在“摧毁”罗马天主教的信仰.传统主义的天主教徒与罗马教廷之间的对抗常常被媒体描绘成一个旨在挽救“旧弥撒”的怀旧运动.①尽管媒体如此轻描淡写,但事实上这一冲突的性质复杂且深刻—既是对“梵二”的意义和有效性的挑战,也是对定义天主教性质的权力和权威的挑战.同时,“传统主义”也是一种抗议,抗议天主教迷失自己的认同,丧失了自己在社会、文化和政治领域中的主导权.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D042738.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5ee83e31-a2d2-4e38-bcfb-9e4d009089e1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